

吉隆坡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发展
Kuala Lumpur Hakkas'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 A Case Study on Tsun Jin Schools'
Development

林丽华

LIM LEE FAH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 2012

吉隆坡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发展
**Kuala Lumpur Hakkas'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 A Case Study on Tsun Jin Schools'
Development**

By

林丽华

LIM LEE FAH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JUN 2012

摘要

本论文题目为〈吉隆坡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发展〉，以客家人在吉隆坡发展的贡献及循人学校的发展为主轴。首先着重论述客家人移民史及他们与吉隆坡的关系，继而通过分析和梳理循人校史及相关文献，从其中观察客家人与循人学校之间的联系。时间断限方面以叶德来 1864 年创建惠州公司为上限，并从本论文收集到的 2011 年资料为下限，论述循人学校的发展过程直至现今的循人学校。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阐明研究动机、研究范围与方法，以及前人研究概况。第二章则着重于客家人与吉隆坡的发展，论述客家人移居到马来西亚的这段移民史，包括客家人移居马来西亚的原因、南来时候的渡海方式和移民类型，以及他们当时的聚居点与他们涉及的主要行业。第三章吉隆坡华人早期的教育模式，论述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始于十八世纪末叶、私塾教育、私塾教育的制度，及吉隆坡最早创办的私塾。第四章循人学校的创办与发展，阐明新式教育之始及所需，循人学校校史与客家人在循人中学所扮演的角色。第五章为结论，对前四章的论述作出总结。总结本文之研究成果，并着重于讨论客家人对吉隆坡和循人学校的贡献与影响。

关键词：吉隆坡 客家人 循人学校 华文教育

Abstract

The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is Kuala Lumpur Hakkas'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n Tsun Jin Schools' Development. The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Hakkas' contributions they made to the constructions of Kuala Lumpur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sun Jin Schools. The discussion will be on Kapitan Yap Ah Loy who was the founder of "Wooi Chiu Kongsi" in 1864 which was renamed The Selangor and F.T. Fui Chiu Associ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sun Jin from the year of 1884 to 2011.

The dissertation comprises of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the introductory part is an exposition of the objective of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profile and methodology. Chapter two is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emigration to Malaysia and focusing on the Hakka emigrants. The discussion will be focused on the Chinese sailing across the seas to Malaysia, the causes forcing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left their own land to earn a living oversea, their suffering and struggle to survive as cheap labours, taking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forming their own community.

Chapter three will discuss on the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late eighteen century. The first private school in Kuala Lumpur was founded by Kapitan Yap Ah Loy in the year 1884. Chapter four will study on the role of the Hakk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sun Jin Schools. Chapter five is the conclusion on the chapters one to four and focusing on the Hakka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sun Jin Schools and Kuala Lumpur.

Key words : Kuala Lumpur Hakka Tsun Jin Schools Chinese Education

谢词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张晓威老师，如果没有张晓威老师的用心、耐心和细心指导，我肯定无法如期完成我的硕士论文。张晓威老师和我一样是客家人，每一回与老师谈论客家人在吉隆坡的发展、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关系或其它与客家人相关话题时，老师精辟独到的见解总是能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往往能将我困惑已久的问题以简要的方式让我能明白掌握，如无老师的循循善诱，我想，我是无法将我的想法如此清晰且脉络分明的呈现在这份论文中。

修读中文系硕士学位是我的一个心愿，少年时期，我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当有机会到拉曼大学修读中文系时，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做出了决定，想不到，这一瞬间的决定，就让我在这学海中度过了将近九年的岁月，从本科到硕士，虽然并没有取得特别标青的成绩，但这几年的时间，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的一段岁月，能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完成《客家山歌研究》与《吉隆坡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发展》的撰写，绝对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努力，这一路上，中文系老师的指点，如：指导我本科论文的林水椽老师、在读书会多次给予宝贵建议的黄文斌老师和郑文泉老师、关心我论文进度的林志敏老师、叶秀清老师、廖冰凌老师、许文荣老师和王介英老师。除此之外，同学的热心襄助更让我感动，谨借此机缘向你们说声谢谢！谢谢骆世俊、黄丽丽、李玮淞、庄蕙洁、林嘉培、欧阳丽萍、钟蕙青、胡春依、Margaret Goon 及 IPSR 的 Ms Wong Fook Moi、Ms Yuen Pei Chuin 和 Mr Loh Yeong Ying。

此外，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来自多方的支援，非常感谢循人中学校长曾贤瑞硕士开放学校图书馆让我能顺利搜寻到许多重要的资料与数据，此外，也感谢循人中学的黄绮丽老师与刘燕萍老师的协助。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茶阳会馆的秘书陈小姐、惠州会馆的秘书萧先生、雪兰莪惠侨互助会的坐办叶校长、总务萧金海先生、财政王有生先生、副主席梁发先生。

在撰写论文的漫长过程中，谢谢我的干女儿陈晓燕和张彩云常常从异国传递过来的温馨问候，虽然她们一位远在西边的荷兰，一位远在东边的上海昆山，但她们从远方传递过来的关怀，却是无时无刻的，谢谢妳们！最后，我也借此机会，感谢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的家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谅解与支持，我又怎么能在无后顾之忧下，坚持完成我任性的梦想呢？谢谢你们萧原子、萧易柳、萧易瑾和陈玟燕，还有我那位刚加入这个世界的小孙子萧以颂！谢谢！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吉隆坡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发展为林丽华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张晓威助理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院长

日期：_____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0.06.2012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林丽华（学号：06 ULM 01898）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张晓威助理教授兼副院长指导之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吉隆坡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发展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
(林丽华)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林丽华

日期：20.06.2012

目录

摘要		ii
Abstract		iii
谢词		iv
论文核实书		vi
论文提交书		vii
论文声明		viii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4
	第三节 前人研究概况	6
	第三节 论文结构	10
第二章	客家人与吉隆坡的发展	13
	第一节 客家人移居马来西亚	13
	一、 原产地（中国）的推力	14
	二、 迁入地的引力	17
	三、 渡海方式	19
	四、 移民类型	20
	五、 客家移民的聚居点与主要行业	23
	第二节 叶德来与吉隆坡的开发	26

第三节	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	34
一、	寺庙	34
二、	医院	40
三、	会馆	42
四、	学校	45
五、	义山	50
第三章	吉隆坡华人早期（二十世纪前）的教育模式	53
第一节	私塾教育	53
第二节	教育制度	57
第三节	吉隆坡最早创设的私塾	60
第四章	循人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63
第一节	私塾至小学时期	63
第二节	初中至高中成立时期	65
第三节	循人中学的发展	67
第四节	循人学校夜学部	73
第五节	循人学校发展的三个时期——雏形期、成长期与成熟期（1885年—2011年）	74
第五章	结论	77
	参考书目	82
	附录（一）：《南华义学条义十五条》	90
	附录（二）：YAP AH LOY AND HSIEN SZU YEN MIAO	91
	附录（三）：1881年7月24日， 叶德来致英殖民政府的一封回函	9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客家人又称“客家”或“来人”，¹他们是非常重视团结合作的群体，在中国大多居于闽粤赣地区，²客家文化具有鲜明的移民和山区居民的色彩，客家居住地成为保存古代文化最丰富、最完美的地区之一。³“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即有客家人。”⁴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常会有人将犹太人和客家人相提并论，并称客家人为东方的“犹太人”。民族学、教育学家庄泽宣对人的生存发展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荒年的时候，最先淘汰的总是身心不甚健全的分子，而能够生存的人，大都总是比较善于顺应环境富于消极抵抗力，很能勤劳，很能忍耐，很能吃苦的人”。⁵今天的客家人，正是自五胡先后入侵中原以来，从北方不断往南迁徙，遭遇了无数灾荒与战争，经过历次自然的人为的选择与淘汰，才保留并繁衍下来的，因此在他们身上也就自然地积淀了这种可贵的“客家精神”。⁶庄泽宣也简扼地说出了客家人的性格特征：

“客家人生性好动，普通男子，无论贫富贵贱，都在外经营各业，如所营成就，则更以出外为荣；若所营不遂，则以为将为社会所薄，不敢轻易返里，必定想法在外自立；客家人更生性冒险，只知进取，只知出路，至于前途如何完全不

¹肖平：《客家人》，成都：成都地图出版社，2002年，页70-71。

²葛剑雄、安介生：《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74。

³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62。

⁴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页363。

⁵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页486。

⁶刘锦云：〈论客家人的性格特征〉，《客家研究辑刊》1993年第2期（总第3期），页58。

管，他们所怕没有路走，生死时常不计，所以他们常说：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掌灶炉。”⁷

客家人是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与尊师重道的汉族民系之一，客家妇女常这么说：“有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不读诗书，有目(眼)无珠”；“不读书不成器”。甚至为了缴付孩子的学费，帮人打担(当挑脚)挣钱，还认为即使讨食也要缴子读书。由于经历过艰辛的日子，他们深刻了解到教育的重要性，为了灌输小孩爱读书的思想，客家人还把读书和娶妻联系起来，在童谣中唱道：“蟾蜍婆，蟾蜍婆，罗咯罗，唔读书，冇老婆。”刘锦云在〈论客家人的性格特征〉一文中也提到：

“为了教育孩子爱读书，为了保障后代子孙有书念，宗族长辈常把办私塾当成一件大事，规定祖偿田中拨出一笔稻谷支付私塾先生的教书薪金。旧时客家地区把教书人尊称为先生，把教书先生的妻子尊称为先生娘，人们信奉“天、地、君、亲、师”的信条，认为教师的职业是尊贵的。客家人普遍尊重教师、尊重知识，‘识斯文，敬斯文’是他们的口头禅。”⁸

太平天国失败後，不少客家人被迫分散在更广阔的地区，有的转徙台湾、香港，或侨居南洋一带。最早对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口进行调查与报告者，是来自英国传教士肯贝尔(George Campbell)和美国现代文化地理权威杭廷顿(Huntington)，肯贝尔在其1912年发表的《客家的源流与迁移》中认为“能操客语的人口，已达1500万”；而杭廷顿则在其《种族的品性》中谓：“客家的人口，总数在1000万以

⁷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页496-497。

⁸刘锦云：〈论客家人的性格特征〉，页63。

上”。肯贝尔和杭廷顿的数据较为笼统，争议性颇大，而后罗香林根据客家人口进行较为精密的估计，他首先从各地志书及谱谍，以及个人亲向客家人士访问所得的消息，与其他零星记载进行资料排比，初步列出了纯客县和非纯客县，然后根据 1922 年《中国年书》所载中国各省人口调查报告，和当年 2 月广东省政府所公布广东各县人口报告，以及陈达《中国之移民》关于台湾客家人口数据，得出 1920 年代客家总数为 16,548,074 人。根据同样的方法，罗香林在其 1950 年发表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中，估计客家总人口（包括海外侨胞）“约为 2520 余万人”。⁹近年来对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口进行作出较为精准统计的单位，是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于 1994 年在“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通过多种渠道，包括全世界的函调、采访、采摘报刊材料等方面汇总统计，大会公布了较为准确的数据：客家人分布中国 14 个省(市、区)以上，共 230 多个县市，总人口共 5512.8 万人；海外五大洲 81 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共 454.629 万人；台湾省 460 万人，香港 125 万人，澳门约 10 万人。全世界客家总人口为 6562 万人，其中马来西亚就占了 100 万人，是除了中港台和印尼外，最多客家人的聚居地。¹⁰

从上文不难得到一个结论，马来西亚已逐渐成为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而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与发展，更是需要有不同的学者从各个层面与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以免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封尘甚至消失。早期南来的客家人，多属于“华工”型（The Coolie Pattern）¹¹，是出卖劳力者。他们来到马来半岛，大多是锡矿业与橡胶业的劳力者。这些劳工者后来有的成为开采锡矿的业

⁹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页 59。

¹⁰1994 年中国梅州市为在梅州举行“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通过多渠道，包括国内外函调、采访、采摘报刊材料等方面汇总统计，客家人在国内外分布人数共 6562.429 万人，其中国内 6107.8 万人，国外 454.629 万人。转引自《客家》，《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1 年 2 月 14 日。

¹¹王廣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4 年，页 7。

主与橡胶园主。在马来西亚早期的经济发展史，客家人所作出的贡献，可谓功不可始。对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生活的痕迹、发展的过程和在不同阶段的研究绝对有其必要，收集、整理、研究及撰写工作是不容忽略的，唯有文字的记载才能使日后的人对历史有更明确的认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过去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课题上，在撰写方言群课题（例如客家）方面的研究是相对贫乏的。目前较少人从地缘性组织的角度切入去撰写方言群与华文学校的发展。客家人是马来半岛最早成立地缘性组织的族群，据吴华的研究，客家人於 1801 年成立的檳城嘉应会馆。¹²此外，与吉隆坡关系密切的客家人叶德来（叶亚来）¹³更是吉隆坡第一所私塾的创设者。

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做为雪隆区第一间私塾的“唐文义学”及至发展到现在的“循人学校”，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客家人创建会馆、创设私塾及至创办循人学校？这个中的发展脉络是非常需要有人去进行梳理与分析，以给予这段重要的历史作出公正的定位与评价，深入探讨其发展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更是刻不容缓。

第二节 研究方法 与 范围

本文的资料大部分是文献、史料、著作、论文与评析文章，尤以循人学校校史及吉隆坡客家方言群的发展史为主，继而将这些收集到的资料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归类，并以前人的评论为基础，结合史学与社会科学（例如：“推力”和“拉力”）的相关

¹²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年，页15。

¹³客家人一般上喜欢以“亚”字带头简称人的名字。叶亚来的原名是叶德来，客家人也就以“亚来”称呼他，就这样约定俗成，叶德来被书写成叶亚来。这是生活中观察所得出的浅见，同时认为在学术上或非学术上都应该用他的原名。张晓威亦有同样说法，此说法收录于潘永杰整理：〈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争议〉座谈会纪要，《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第十期，2010年1月，页41。

理论，再以访谈、口述历史为辅，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从中考察客家先辈、先贤对马来西亚发展的种种贡献。时限方面，本文研究的时间上限为二十世纪以前，即客家人的移民与吉隆坡的开发起始；时间下限为 2011 年，即当前循人学校的发展情况。研究范围主要圈定于吉隆坡的客家人社区，因为吉隆坡是早期客家移民主要的聚居地区，许多社区发展都与客家人息息相关，本文考察的循人学校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例证。

本文将先从华人移民史的角度切入，首先交待华人南来马来（西）亚的移民历程，论述中则着重于客家方言族群。再进一步探讨客家人与吉隆坡社区的关系，从具体的会馆、庙宇与私塾的创立来考察客家人对早期吉隆坡的经济发展与贡献。将由此脉络继续探讨客家人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除了论述循人学校与客家人的关系，同时也检视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对华文教育的影响。对于校史与吉隆坡发展史的史料不足之处，本文也尽量以访谈与口述历史加以补充。

本文将从“客家人在吉隆坡的发展”以及“循人学校的发展”两条主线展开论述。最早在吉隆坡成立地缘性组织的是客家人，叶德来于 1864 年创建惠州（公司）会馆于吉隆坡罗爷街巴生河畔，并于 1868 年后迁至吉隆坡茨厂街现址。¹⁴循人学校的创办与发展可追溯至 1884 年，是当年吉隆坡第一间私塾——唐文义学，且从家乡中国惠州礼聘清朝举人叶树纲担任教学工作，这是由于南来同乡日增，年幼子弟人数也与日俱增。此间私塾后来易名为唐文义学，并增聘徐绍荪执教。先后在此学塾任教的有黄志光、曾赞廷、涂汉秋、李碧云父子等塾师。中国自中英鸦片战争（1840）及中日甲午战争（1894）战败之后，签订割地赔款等不合理的条约，致使有识之士提倡改革教

¹⁴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届执委会编：《雪隆惠州会馆馆史》，吉隆坡：雪隆惠州会馆，1997 年，页 57。

育以达致富国强兵及走向现代化。光绪皇帝于 1898 年颁布“国是”诏，令全国进行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式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同时将此项教育改革推广至海外。马来亚的华人受到此项改革之影响，纷纷筹办新式学校。于是唐文义学于 1913 年改为现代新式华文小学，取名“循人学校”。

为了更完整地阐述循人学校的发展，本文将从吉隆坡华人早期(二十世纪以前)的教育模式开始论述，描绘华文教育的发展过程，从私塾教育至较为完善的中小学体制，并参照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以便能从各个不同的切入点，深入地探讨循人学校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前人研究概况

以学校为个案研究是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方式之一，类似的研究在学术界不乏其人，除了妥善地对该学校的历史做出梳理，更能够深入地观察该校创立的源头、办校的艰辛和发展的过程，亦能对该校做出较完善分析与论述。

袁慧芳编的《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¹⁵，主要是通过史料汇编的方式，从循人学校的基本资料（校训、校歌）、历任中小学校长，同时也将校服、校徽、校景及重要的文献以照片的方式呈现出，更列出了循人学校许多重要的活动及学生的成就，详尽地将循人学校 1913 年至 1963 年的许多重要资料记录下。然而这本书只收集到 1913 年至 1963 年的资料，由于只对循人学校在早期的源流、私塾创

¹⁵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 - 1963 年》，吉隆坡：大栅企业有限公司，2011 年。

设进而发展到小学乃至中学的演进做论述，因此，本研究将对 1963 年后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以期能将吉隆坡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发展从更多的面向，进一步的讨论与分析。

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深入的古鸿廷，亦曾多次以此方式对马来西亚华文源流的学校进行细致且深入的分析研究。古鸿廷在《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一书中，收录了四篇以独中为个案研究的论文，分别是〈吉隆坡之中华独立中学〉¹⁶、〈柔佛之宽柔中学〉¹⁷、〈麻坡之中化中学〉¹⁸、〈吉隆坡之坤成女中〉¹⁹，这四篇论文呈现方式都大致相同，首先在第一节的前言阐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进而在第二节里对论文研究对象的背景进行详述，然而在紧接着的书写却又有所不同，古鸿廷根据不同独中的发展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撰写〈柔佛之宽柔中学〉和〈吉隆坡之坤成女中〉时，第三节是以中学之创设与早期发展，第四节则进一步论述中学成为华文独立中学之发展。〈吉隆坡之中华独立中学〉则是在第三节论述了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成立与发展后，更在第四节及第五节深入分析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之行政架构与学校的师资、学生、学制和考试制度，这与〈麻坡之中化中学〉在第三节分析中化中学的董事会、校长与教师及第四节中化中学的课程与学生，是非常相似的，都是深入独中本身的行政架构与其课程中去深入地剖析独中的实际、具体的运作。古鸿廷以独中为个案研究的论文扎实而不花俏，通过分析所掌握

¹⁶本文初稿宣读于 2000 年台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究会，淡水，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2000 年 5 月 12 日，现收录于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150-192。

¹⁷本文初稿宣读于近二十年来的海外华人学术研讨会，南港，“中研院”近史所，2002 年 4 月 19 日。现收录于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193-220。

¹⁸本文初稿刊载于《海华与东南亚研究》，第一卷，第二期，2001 年 4 月，页 1-27。现收录于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221-254。

¹⁹本文初稿宣读于 2002 年台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究会，高雄，中山大学，2002 年。现收录于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255-254。

的实际资料与数据，精确地把握该独中的特点，平实地进行分析与论述，四篇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有一节讨论，在此节中对所涉及的独中进行了简短而深入的讨论，让论文中添加了其独特见解与点评。

利亮时〈1969年马来西亚种族冲突事件及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²⁰主要是分析1969年513事件的导火线及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马来人与华人在1960年初期就教育问题各持己见，互相僵持不下，以至分歧日益加深，此为513爆发的导火线之一。513后的教育政策有重大的转变。政府致力提高马来人的教育水平，大专院校实行固打制（土著占55%，非土著占45%），入学资格也有别于他族，奖学金也实行固打制，很多马来中学生毕业后被保送出国深造。董总、教总及华社于1973年发起独立中学救亡运动，以及三语并重的教育政策获得华社的认同，主因政府源流的学校则偏重马来文轻英文，使得独立中学复兴起来。

利亮时〈马国华文教育的发展道路：逆境挣扎与永继经营〉²¹在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如何在逆境中求存，以及如何让华文教育永不熄灭。“513”种族暴乱事件后，政府不但极力推行以马来文（马来西亚的国语）为唯一的教学媒介语，即走向单一源流的教育政策，还大大增加马来人接受大专院校的机会，提升马来人在社会各领域的实力，加速打压其他源流的教育，大大减少华人子弟进入大专院校的机率。在这种困境之下，董教总发起独立中学复兴运动，致使华社与华文教育运动结合，并成为华教前进的动力。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虽在困境中生存下来，华教应现代化经营，让华文教育拥有壮大与国际化的未来。

²⁰利亮时：〈1969年马来西亚种族冲突事件及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海华与东南亚研究》，第二卷，第一期，2002年1月，页90-108。

²¹利亮时：〈马国华文教育的发展道路：逆境挣扎与永继经营〉，祝家华、安焕然主编：《探索大马高教发展路向》，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8年，页63-80。

曹淑瑶〈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困境〉²²这篇论文着重在讨论整个马来（西）亚教育政策之演变脉络，华社对这些教育政策的反应，以及华文教育在这些教育法令之下发展的困境。作者从所涉及的“报告书”及教育法令论述这些教育政策对华教的不利及华社的反应与对策。

古鸿廷、曹淑瑶、张晓威〈战后马来亚地区闽南人与华文教育之发展〉²³重点在于论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自二战后所面对的打压，以及闽南人在华文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二战后英殖民政府藉以教育法令压制华文教育的发展，马来（西）亚华人却没屈服，而是更加的维护母语教育，致使华文教育有个完整的体系。华社捍卫华教的过程中，闽南人作出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课题的本地学者当中，郑良树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完整的论述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辛酸发展史。马来西亚华文小学与华文中学的总数约 1370 所，郑良树并没有个别的论述每一间学校的创办过程与发展。林水椽也发表过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论文。其中与本研究有关连的两篇论文分别为〈独立前华文教育〉²⁴与〈马来西亚小学及中学华文教育的发展〉²⁵。〈独立前华文教育〉反映出马来西亚独立前华文教育的一个轮廓。这篇论文所涉及的范围：一、早期华社自资创设的私塾、义学至现代式华文小学而中学，以及南洋大学的创建。二、华文教育发展的高峰期（二十世纪的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三、华社对《巴恩报告书》、《拉萨报告书》、《达立报告书》及《1957 年教育法令》的反应。另一篇〈马来西亚小学及中学华文教育的发展〉却偏重于论述多份报告书对华文学校的不利与其带来的

²²曹淑瑶：〈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困境〉，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 年，页 287-306。

²³古鸿廷、曹淑瑶、张晓威：〈战后马来亚地区闽南人与华文教育之发展〉，庄国土、林忠强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年，页 80-107。

²⁴林水椽：〈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年，页 215-254。

²⁵林水椽：〈马来西亚小学及中学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椽：《马中文教与思想抉论》，怡保：艺青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页 60-81。

后果。例如 1951 年的《巴恩报告书》、1960 年的《达立报告书》（检讨《拉萨报告书》）及 1961 年教育法令（其中最使华社担忧的是 1961 年教育法令 21 条（2）的条文：“教育部部长于适当时期可以下令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

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²⁶这篇论文着重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的马来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并且对于官方所指定的政策对华文教育所造成的伤害做了详细的论述。除此之外，作者也点出了“五一三事件”后，官方又作出重大的宣布：从 1970 年一月开课的一年级开始，再也没有所谓的国民型英文小学。换言之，原本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型英文小学，即改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到了 1977 年，所有国民型中学的教学媒介语也将改用国语。这导致华小人数大大的增加。

第四节 论文结构

本论文题目为《吉隆坡客家人与循人学校的发展》，主要是对客家人在吉隆坡的发展及循人学校的发展进行深入的论述，更藉此分析吉隆坡客家人对循人学校的影响与作用。

本文分成五章以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阐明研究动机、研究范围与方法和前人研究概况。第二章则着重于客家人与吉隆坡的发展，此章第一节将对客家人移居到马来西亚的这段移民史作出分析，包括客家人移居马来西亚的原因、南来时候的渡海方式和移民类型，都作出了详尽的叙述，同时亦清楚罗列出客家移民到马来西亚后的聚居

²⁶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 年，页 283-301。

点与他们涉及的主要行业。第二节则对客家人叶德来在吉隆坡的开发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第三节则对吉隆坡华人社区形成的主要设施分成五类，即：寺庙、会馆、医院、学校和义山，这五个主要分类是华人在当地生活后逐渐产生的主要设施。这五项设施形成的过程，恰恰对应着华人移民在当地扎根的发展脉络，寺庙的形成最早，大多数离乡背井来到异乡的人，急需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信仰就给予他们心灵与精神上最好的慰藉，所以华人聚居的地方，最早会出现供奉神像和神龛，待得经济能力允许后，他们就会凑钱建神庙，一来酬谢神恩，二来又可促使各籍贯的方言群和谐相处，在当时更是众人交换讯息和聚集的场所，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地方。会馆则更有效地将血缘性与地缘性的人群聚居在一起，拥有共同血缘性或地缘性的人，会形成更坚实可靠的关系，让在异乡的人能互相信任、互相帮忙。随后，医院、学校和义山也逐渐创立起来，形成该区域的主要设施之一。

第三章将探讨吉隆坡华人早期（二十世纪以前）的教育模式，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始于十八世纪末叶，开始时是以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模式进行，是华人社会中普及的教育模式，文中将针对私塾的源流及私塾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做出论述。紧接着将仔细地介绍私塾教育的三个形式：“教馆（坐馆）、私塾（家塾）和义塾（义学）”，并对私塾教育的课程做出分析及介绍。最后，则对吉隆坡最早创设的私塾——唐文义学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第四章将循人学校的发展分成四个部分来论述，第一节是从私塾至小学时期，第二节是初中至高中成立时期，第三节是循人中学的发展，第四节是循人学校夜学部，最后第五节则将循人学校从 1885 年到 2011 年长达 126 年的发展过程分成三个时期，

即雏形期（1885 年-1913 年）、成长期（1913 年-1962 年）和成熟期（1962 年-2011 年），尝试从不同时期去分析客家人在循人学校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此章节中亦从学校的建设包括学校设备、校地、校舍等设施与师生人数发展等数据进一步分析。

第五章为结论，将会对前四章的论述作出总结。总结本文之研究成果，并着重于讨论客家人和循人学校在吉隆坡的贡献与影响。

第二章 客家人与吉隆坡的发展

第一节 客家人移居马来亚

“据史料记载，宋代末期已有部分敢于闯荡天下的客家人零星前往东南亚。到了十八世纪，客家人已在东南亚各地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梅县客家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客家人理想社会，岛内居民共同劳动、开矿，享受人人平等的“大同”生活，这是客家大本营中桃花源生活的一种变异。”²⁷

客家人迁移海外，由来已久，移民人口也遍及五湖四海，正所谓“日照之处有华人，华人之处有客人”。这句话真实的反映了海外客家人的实况。目前居住在五大洋洲（不包括中、港、台）的客家人约为 411.935 万（非官方数字）。²⁸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形成与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源自于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南来。²⁹

表 1: 19 世纪末叶至 20 世纪初期马来亚的中国移民人数

时期	移民总人数
从 1877 年至 1899 年	2,903,000 ³⁰
从 1904 年至 1913 年	2,099,885 ³¹
从 1931 年至 1941 年	2,294,959 ³²

²⁷肖平：《客家人》，页 53-54。

²⁸罗英祥：《飘洋过海的客家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22。

²⁹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

³⁰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怡保：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 年，页 27。

³¹曾松华：〈华族南移的背景与动向〉，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37。

³²曾松华：〈华族南移的背景与动向〉，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39。

表 1 记录了三个时期迁入马来亚的中国移民数量，从数据上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讯息，二十世纪之前的移民人数平均一年为 13.2 万人，然而在二十世纪的统计数据都明确说明二十世纪之后的移民人数平均一年为 23.1 万以上，可见迁徙入马来亚的中国移民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下文将针对这时期的中国移民潮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

一、原产地（中国）的推力

原产地（中国）的推力主要有三个，一、原住地的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二、中国国内的政局动荡不安，三、面对经济困境，不得不向外迁徙。在鸦片战争爆发与太平天国失败之前，中国并未出现大规模往外迁徙的现象。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期，由于中国国内的政局愈来愈动荡，又遇上多次的自然灾害，除了大水灾及大旱灾之外，还有蝗灾、大风灾、瘟疫和地震（请参阅附表 2）。

表 2：1912 年-1937 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³³

年份	灾荒性质及其影响
1912	闽、粤、湘、赣各省大水灾。
1914	粤、桂、湘、赣等省大水灾。
1915	粤、浙、皖各省大水灾。
1918	闽、粤、湘、鄂、鲁等省水灾。同年，闽、粤、苏、浙四省发生地震。
1922	汕头遭台风扰躏，生命财产损失无数，许多居民因家破人亡而被迫离乡背井。
1924	闽、粤、湘、桂、鄂等省大水灾。
1925	粤、冀、桂等省均发生蝗灾。同年，粤、闽、桂等省发生旱灾，波及 535 个县，灾民达 3, 339 万人。
1929	华北晋、绥、察、冀、豫、陕、甘等七省发生大水灾。
1931	陕西、河南两省发生旱灾。同年，长江大水泛滥，受波及区域广达 16 省，灾民人数高达 5, 000 万人，人民流离失所，死亡载道。
1932	粤、吉、黑、豫等省大火灾。
1933	闽、粤、陕、豫等省发生旱灾。
1934	闽、鄂、湘、豫、冀等省发生大水灾。
1935	闽、冀、豫、赣等省发生旱灾与蝗灾。同年，粤、黔、陕等省发生水灾。
1937	闽、粤、豫、冀等省发生瘟疫，死亡无数。

³³曾松华：〈华族南移的背景与动向〉，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3。

自然灾害致使许多贫苦的中国人选择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而马来亚正是当时大量移民的目的地之一，这也直接促使马来亚各籍贯的侨民人数剧增。迁入马来亚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来自闽粤两省的福建人、潮州人与客家人。

“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这句话阐明了客家人居住的地理环境。由于丘陵山区，往往土地贫瘠，因此闽粤两省可耕之地不多，而且自然灾害直接危害农村的经济作物，农作物经常收成不佳或被灾害所毁，农民却还得照样缴付苛捐重税（农耕地大都归富裕的大地主所拥有）。这可说是雪上加霜。在偏远的山区，工商业又不发达，人民无以为生，不少男人被生活所迫，无计可施之下，不得不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去海外谋生，谓之“过番”。换句话说，经济困难为移民的主要因素。从以下三首客家山歌，我们可以理解客家男人“过番”的由来与感受。

(一)

莫话阿哥命咁歪，飘洋过海唔单涯。

恸倒唐山咁辛苦，唔当番片揸锡泥。³⁴

(二)

一心种竹望上天，唔知紧大尾紧弯。

一心同妹望偕老，唔奈家贫去过番。³⁵

³⁴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页 300。

莫话：客家方言，意思是“别说”。

咁：客家方言，意思是“这样”。

咁歪：客家方言，意思是“这样不好”。

唔：客家方言，意思是“不”。

涯：客家方言，意思是“我”。

唔单涯：客家方言，意思是“不只是我一个人”。

恸倒：客家方言，意思是“想到”。

唔当：客家方言，意思是“不如”。

番片：客家方言，意思是“海外”。

揸 客家方言，意思是“锄”。

³⁵吴永章：《客家传统文化概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 398。

唔知：客家方言，意思是“不知道”。

(三)

无食无着甚艰难，想来想去想过番。

想起在家难过日，迫到过番担锡泥。³⁶

这三首客家山歌皆印证了当年“过番”马来亚等地的客家移民绝大多数是穷人。也道出了客家男人“过番”的主因即家乡生活贫困不好过。由此，也让人体会到那种无奈的情怀。

华南的闽粤两省濒临南中国海，地理位置接近南洋群岛，依靠南中国海的东北季风风南下，即可抵达南洋群岛地区如：越南、菲律宾群岛，泰国（旧称暹罗）、马来亚半岛及印度尼西亚群岛。因此，当闽粤两省的人民被动荡不安的局势所迫（清朝末叶的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再加上农村的经济崩溃。于是利用有利的出洋条件远离家乡到南洋谋生，成为当时的重要出路。当年客家人迁徙的地区主要是东南亚，而马来亚即是一重点。

华人本身具备的冒险精神及善于应变的求生本能，³⁷也是推动华人敢于漂泊异乡谋生的动力。这与客家先民经历了五次境内的南迁有着重大的关系：“根在河洛”的客家先民有过五次迁徙至赣、闽、粤交界的山区³⁸，造就客家人具有刻苦耐劳、冒险精神

紧：客家方言，意思是“越”。

唔奈：客家方言，意思是“无奈”。

³⁶杨鹤书：〈客家人适应方式的转变与他们对马来亚早期开发的贡献〉，郑赤琰：《客家与东南亚》，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页189。

无食：客家方言，意思是“没得吃”。

无着：客家方言，意思是“没得穿”。

³⁷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3。

³⁸根据客家学学者谢重光的研究显示：自唐中叶至宋末，客家先民有过五次迁徙至赣、闽、粤交界的山区。第一次的南迁在唐中后期，主要在安史之乱后，大部分移民至赣南。第二次的南迁在唐末、五代至宋初，即黄巢之乱的

以及善于适应求变的生存本能。在一次又一次迁徙途中的艰苦经历，磨练出客家人即能刻苦也能耐劳的个性。

表 3：1955 年间南来动机³⁹

南来动机		
类别	户数	百分比
1. 经济困难	98	49%
2. 亲戚关系	29	14.50%
3. 地方不安	23	11.50%
4. 寻求发展	21	10.50%
5. 逃壮丁	4	2%
6. 家庭不和	2	1%
7. 行为不好	2	1%
8. 其他	21	10.50%
合计	200	100%

附表 3 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于 1969 年至 1970 年向 200 户由 1900 年至 1955 年间南来新加坡的居民所作的调查报告，从表 3 可清楚了解到，经济困难是造成华人南移最大的动因，接近一半南来的移民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如非在家乡已到了山穷水尽之际，又有谁会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到陌生的地方去谋生呢？每一次的迁徙就得面对一次挑战，长久以来的挑战造就了客家人具备冒险精神。因此，当客家人遇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或走投无路之际，只好冒险南来寻找更美好的明天。

二、迁入地的引力

最早入侵东南亚地区的西方列强为葡萄牙，葡萄牙于 1511 年占领了马来亚的马六甲。1641 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得了马六甲，最后再由英国于 1786 年占领檳城，

影响。第三次的南迁在两宋承平时期。第四次的南迁在两宋之际。第五次的南迁在宋元之际，主要移民至粤东。迁徙至赣、闽、粤山区的高潮在唐末五代至宋初、两宋之际、北宋及南宋的承平时期。

³⁹曾松华：〈华族南移的背景与动向〉，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9。

及至 1824 年英国与荷兰签署了英荷条约，马来亚才逐步成为由英国全面掌控的殖民地，期间又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 1957 年，马来亚才脱离英国的掌控，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十六世纪初叶，西方列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竟先恐后入侵东南亚地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肆意掠夺丰富的天然资源如金、锡等资源。英国人统治（1786 年至 1957 年）的马来亚正好发现蕴藏量丰富的锡苗（马来西亚曾经一度为世界最大锡产国）。英国殖民者除了需要大量的人力开采锡矿之外，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劳工开垦土地种植橡胶（马来西亚也曾为世界最大的天然胶生产国）。于是，英国殖民政府用尽办法在中国四处变相的“招募”劳工——诱骗、拐骗，甚至绑架及强掳。英国是首先到中国“招募”劳工的国家，⁴⁰事因两位英国人莱特（Francis Light）和莱弗士（Sir Stamford Raffles）分别于 1786 年与 1819 年占领马来亚的槟榔屿及新加坡，这两个荒岛需要大量的劳工开发。⁴¹许多客家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运抵”马来亚当廉价劳工，只为了寻求三餐温饱。

航运业工具的现代化——轮船的发明也为中国人往外迁移提供了途径。这是航运史上的一大跃进。往返海外贸易的商船可以在任何时候启航，往返的时间也大大地缩短，因此扩大及加速了网络的建立。这诸多方便引发贫苦的乡民出洋谋生的欲念更为强烈，致使中国人往海外迁移的人数俱增。概括而言，无论外在具备的吸引力是多么的诱人，要不是家中实在贫困，留在家里如同等着饿死的情况之下，相信乡民是不会抛妻弃子及至亲漂泊异乡谋生的。

⁴⁰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吴泽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页 73。

⁴¹颜清煌著，栗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年，页 3。

三、渡海方式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的帆船已经往返东南亚地区。⁴²中国的帆船趁每年南中国海的东北季候风吹向西南时开往东南亚各地，当南中国海的西南季候风吹向东北时就启航返回中国。1821年，新加坡迎来了第一艘从厦门启航的中国帆船。⁴³新加坡为当年南来移民的重要集散地。

表 4：1877 年至 1899 年的中国移民入境记录⁴⁴

年份	由新加坡入境的人数	由檳城入境的人数	中国移民入境记录
1877	10,000	无记录可考	无记录可考
1878	34,000	无记录可考	无记录可考
1879	35,000	无记录可考	无记录可考
1880	47,000	无记录可考	无记录可考
1881	48,000	42,000	90,000
1882	56,000	45,000	101,000
1883	61,000	48,000	109,000
1884	69,000	38,000	107,000
1885	69,000	42,000	111,000
1886	87,000	57,000	144,000
1887	101,000	65,000	166,000
1888	100,000	63,000	163,000
1889	99,000	44,000	143,000
1890	96,000	37,000	133,000
1891	94,000	49,000	143,000
1892	93,000	45,000	138,000
1893	145,000	68,000	213,000
1894	107,000	46,000	153,000
1895	150,000	61,000	211,000
1896	142,000	57,000	199,000
1897	91,000	41,000	132,000
1898	107,000	45,000	152,000
1899	118,000	51,000	169,000
总人数	1,959,000	944,000	2,777,000 2,903,000

⁴²李小燕：〈新加坡客家移民史与移民经验〉，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8。

⁴³李小燕：〈新加坡客家移民史与移民经验〉，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页18。

⁴⁴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27。

依据 1877 年至 1899 年的中国移民入境记录，大部分的中国移民在新加坡上岸，然后被乡亲、“水客”或中间人带往马来亚。⁴⁵

汕头于 1861 年开埠。⁴⁶当年南来马来亚的客家人，梅州地区的大多由汕头出海“过番”，惠州及广东中南部的则由广州、澳门等口岸登船出发，经新加坡抵达马来亚。⁴⁷轮船发明以后，往返新加坡或槟榔屿的航程只需七天七夜。轮船每月往返数次，无形中促使更多的中国移民南来马来亚谋生。由于需求量有增无减，商人为求暴利，船舱的条件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恶劣。如有人在船上染上传染病，为防范痢疾的蔓延，在病人尚未断气前就被抛入大海。这些“过番”者的生命毫无保障。船上的环境如同阴间，一日三餐不饱是平常事。因此，运输苦力华工的船，被称为“海上浮动地狱”。⁴⁸

四、移民类型

学者对于中国移民迁徙的说法并不统一，其中颜清湟在《新马华人社会史》中提出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和“赎单制”这两种中国移民的类型，然而颜清湟的说法却只关注到“正当”方式迁徙的中国移民，忽略了那些以强掳、拐骗等“非法”手段强行被送来南洋的人，林水椽和骆静山在《马来西亚华人史》所提出的另外两种类

⁴⁵ “水客”这一行业兴起于 20 世纪中叶后。“水客”受人委托（有一定的收费）往返中国乡下把指定的人带回来马来亚。有了一定积蓄的单身移民劳工，通过家乡的亲人物色女子，然后再委托“水客”带出成亲。“水客”返回马来亚的时候还顺便带些玉器、中药材等方便携带的物品上门兜售。（笔者对“水客”的印象深刻，清晰记得小时候上门兜售玉器的“水客”总爱穿白衣白裤。梁佛容女士与何丽琼女士也这么说。梁佛容女士小时候的邻居风油伯操“水客”业多年。由于这位“水客”兼卖风油，因此街坊都称呼他风油伯）

受访者：梁佛容，访问者：林丽华，时间：5-3-2011（上午 11 时 30 分），地点：雪兰莪州梳邦市。

受访者：何丽琼，访问者：林丽华，时间：5-3-2011（下午 3 时 15 分），地点：雪兰莪州梳邦市。

⁴⁶ 李小燕：〈新加坡客家移民史与移民经验〉，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页 18。

⁴⁷ 杨鹤书：〈客家人适应方式的转变与他们对马来亚早期开发的贡献〉，郑赤琰：《客家与东南亚》，页 188。

⁴⁸ 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页 29。

型：“强制劳工”和“契约劳工”则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移民的类型。本文会结合颜清滢、林水椽和骆静山的说法，将其统一成：一、基于亲属关系；二、赊单制；三、强制劳工；四、契约劳工，四种移民类型。

第一类型的移民属于少数。这类型的移民原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并决定居住在马来亚。他们为了找到可信赖的员工协助经营生意（如店铺、种植园丘、锡矿场等），便亲自返回中国乡下或通过“水客”把亲属带到马来亚，船资由他们本身先为垫付。也有不少过番后，便援引亲戚朋友到马来亚找生计。⁴⁹

第二类型的中国移民，由于贫穷无能力支付出洋船资。船资由客头（又称“猪仔头”）、⁵⁰船长或劳工代理先行垫付。到达新加坡或槟榔屿之后，这些赊单的移民即被转卖给雇主。雇主把这些赊单移民的船资加上客头或船长或劳工代理的佣金付给客头或船长或劳工代理。雇主与这些移民签订合约或达至口头协议，以劳动抵消其债务。完成规定年限的工作之后，这些赊单移民才恢复自由身，从此可以自由的选择工作。

第三类是强制劳工移民。此类劳工大多数于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中至五十年代抵达马来亚。⁵¹顾名思义，这类移民有的是被人强掳售予买主；有的则是受拐骗而后被强行带到马来亚当劳工。

⁴⁹受访者：梁佛容，访问者：林丽华，时间：5-3-2011（上午 11 时 30 分），地点：雪兰莪州梳邦市。

受访者：何丽琼，访问者：林丽华，时间：5-3-2011（下午 3 时 15 分），地点：雪兰莪州梳邦市。

例一，祖籍梅县的梁佛容女士（大约七十岁左右）的父亲梁志豪在年约二十岁时通过“水客”的引领到达槟榔屿，而后定居吉打州从事裁缝工人。例二，祖籍新会的何丽琼女士（今年七十二岁）的伯父何均是“猪仔贸易”的受害者。当年何均才十八岁，抵达马来亚之后被押去开发垦殖区种植橡胶，工作了 4 年后才恢复自由身。过后他在新街场（Sg. Besi）一带从事矿工而后成为矿主。何均的后代（目前共三代：儿子、孙子、曾孙）现居吉隆坡，为富裕的家族。当何均恢复了自由身，他即托“水客”把他年龄十岁的弟弟何朝柏（何丽琼女士的父亲）带来马来亚跟着他在矿场工作。

⁵⁰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页 522。

⁵¹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3。

第四类则是契约劳工移民。此类劳工移民是十九世纪中叶后的产物。⁵²从表面看，“契约”是合情合理的建立在你情我愿的基础上。实际上有很多契约劳工是在受骗的情况之下被迫签订工作契约的。

第三类的强制劳工移民与第四类的契约劳工移民，都可谓“苦力贸易”，也可谓“奴隶贸易”。“苦力”是英语 coolie 的音译，此字源自突厥语 Kuli，意指奴隶。⁵³这两类劳工移民的本质是贩卖，因此也被称为“猪仔贸易”。“苦力贸易”主要操纵于西方列强的商人即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手中。在输出苦力之前，此类“猪仔”被囚禁在“Barracoon”⁵⁴，“Barracoon”葡语，音译“巴巴坑”又称“猪仔馆”、“卖人行”、“咕叭行”等，指囚禁奴隶和罪犯的场所。⁵⁵

这些“猪仔馆”都设于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如厦门、澳门、汕头、香港等地。“苦力”抵达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口岸即被当作货品出售。还未被卖出的，则被囚禁在当地的“猪仔馆”。在整个过程中，苦力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一般“猪仔馆”都是既简陋又不通风的小栅屋。如有“苦力”试图逃跑，把守的秘密社会成员将施以暴力。⁵⁶无论是赎单移民、强制劳工移民或契约劳工移民，他们所过的生活都是非常艰辛的，每天都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即使契约劳工有“契约”在手，但还得看雇主是否履行“契约”的承诺。更甚的是有些无良雇主以鸦片和赌博为饵，使那些合约期满的劳工仍然

⁵²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3。

⁵³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6 卷，页 521。

⁵⁴巴素，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 年，页 136。

⁵⁵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6 卷，页 522。

⁵⁶颜清湟著，栗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7。

继续为他们效劳。这种情况一直到 1914 年，英殖民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废止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契约劳工制度后，⁵⁷中国移民从此才免身受其害脱离魔境。

五、客家移民的聚居点与主要行业

中国移民于十九世纪迁入马来亚之后，主要聚居于港口、矿区和农村。而又以矿区的聚居点较为特出，即以客家矿工居多。华人分别于 1815 年、1840 年及 1857 年在雪兰莪的芦骨（Lukut）、间征（Kanching）及暗邦（Ampang，现称安邦）开采锡矿。芦骨于 1878 年才划归森美兰。⁵⁸芦骨矿场的矿主为雪兰莪皇族拉惹布素（Raja Busu）。1824 年，芦骨矿区的华人矿工共有二百名，多为惠州人；十年后，芦骨的矿工增加至 300 至 400 名；到了 1850 年，芦骨的矿工人数增加至 2000 名。⁵⁹

间征位于吉隆坡以北约十里，是雪兰莪河上流盆地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巴生谷（Klang Valley）。⁶⁰位于间征的第一个矿场属于拉惹阿都沙末（Raja Abdul Samad，1857 年成为苏丹），在那里工作的华人矿工大多为客属的嘉应州人。⁶¹1857 年，巴生统治者拉惹鸭都拉（Raja Abdullah of Klang）与芦骨的拉惹朱玛亚（Raja Juma'at）兄弟在安邦挖掘锡苗，二年后终于发现安邦矿区锡苗蕴藏量丰富。⁶²与此同

⁵⁷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3。

⁵⁸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 19。

⁵⁹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 19。

⁶⁰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 - 1895*,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s (M) Sdn. Bhd, 1988, pg. 10.

⁶¹黄文斌：〈论析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客家人的参与（1859 - 1920）〉，《亚洲文化》第 32 期，2008 年 6 月，页 105。

⁶²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 19。（一般历史著作把 Raja Juma'at 译成拉惹末马，笔者认为译成拉惹朱玛亚较为适合。）

时吉隆坡也发现蕴藏丰富的锡苗，至 1860 年中，吉隆坡的华人矿工人数已有 5000 至 10000 名。安邦与吉隆坡的华人矿工大部分是客属的惠州人。⁶³

霹靂州拉律的两个矿区——克连包 (Klian Pauh, 现称太平)⁶⁴与新克连 (Klian Baharu, 现称甘文丁)，这两个地区的矿场都是酋长拿督约翰 (Dato Johan) 的儿子朗渣花 (Long Ja'afar) 于 1847 年发掘及拥有。这两个矿区的华人矿工的籍贯有明显的区别。太平 (Taiping) 矿区的华人矿工多属新宁、新会、肇庆、惠州 (四县)，大抵是客家人。⁶⁵而甘文丁 (Kamunting) 矿区的华人矿工则多属中山、番禺、顺德、南海、东莞 (五县)，以粤人为多数的族群。⁶⁶

从以上所提及的矿区：芦骨、间征、安邦、吉隆坡、太平与甘文丁的矿工以华族客家人为最。矿区得于稳定的发展，印证了马来西亚内地城镇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锡矿的开发。最明显的例子如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 (Kuala Lumpur)；联邦直辖区的新街场 (Sungei Besi)；雪兰莪州的安邦 (Ampang)，万挠 (Rawang) 与加影 (Kajang)；霹靂州 (“霹靂”是马来西亚国语的音译，Perak 的意思是指“银”。当霹靂州境内发现大量锡苗，土人误以为白银，于是把那个州称为“银”。⁶⁷) 的怡保 (Ipoh)、太平 (Taiping)、华都牙也 (Batu Gajah)、金宝 (Kampar) 与美罗 (Bidor)；以及森美兰的芙蓉 (Seremban)。

⁶³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 19。

⁶⁴克连包改称为太平有其历史因由。郑景贵率领的客家帮海山公司与陈亚炎率领的广府帮义兴公司先后于 1862 年及 1872 年为争夺霹靂州拉律 (Larut) 地区的矿地而爆发了著名的“拉律战争”英殖民政府介入调解，并于 1874 年一月二十日在邦咯岛签署《邦咯条约》，Pangkor Treaty。即以“太平”命名以示永久和平之意。

⁶⁵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 13。

⁶⁶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 13。

⁶⁷邹豹君：〈星马文化发展的地域分析〉，程光裕、许云樵等：《中马中星文化论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合作，1968 年，页 108。

客家移民也定居在乡区开芭农耕，比如客家移民来到锡苗蕴藏量不多的柔佛州，求生毅力强而善变以适应环境的客家人，毅然选择开芭垦殖。如柔佛古来（Kulai）、泗隆（Seelong）、沙令（Saleng）、士乃（Senai）、加拉巴沙威（Kelapa Sawit）、亚逸文满（Air Bemban）及武吉巴都（Bukit Batu）的客家人多以种植黄梨与蔬菜、割胶、务农劳工及养猪为生。崑崙喇叭新村（位于霹靂州怡保郊外三英里半，本人居住的新村）也不例外，村民（以客家人为众）同样以种菜和养猪为主。⁶⁸

从十九世纪至今，马来西亚的港口商业活动主要是由闽南人和潮州人所控制。这应该归功于闽南人与潮州人的原产地（即中国福建与潮州）的天然地理位置——东南沿海。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因此闽南人与潮州人比居住在深山的客家人较早接触到外来阿拉伯商船的贸易活动。上述原因间接造成居住在港口的客家移民不多。时至今日，马来西亚的四大主要港口的居民也还是以闽南人与潮州人为主。这四大港口一为位于雪兰莪州的巴生港口（Port Klang）；二为位于檳榔嶼的檳城港口（Port of Pulau Pinang）、三和四为位于柔佛州的巴西古当港口（Port of Pasir Gudang）及丹絨柏勒巴士港口（Port of Tanjung Perlepas）。客家人迁入后所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开采锡矿业，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者少。原因出于客家人没有经商经验，其次是没有做小本生意的本钱。因此，只好以劳力谋生。这是十九世纪客家移民区别于其他方言群移民的显著标志。

⁶⁸清晰记得那两位皮肤黝黑，但体格相对“牵猪哥”的老伯伯——亚福伯（个子矮小）、亚贵伯（个子高大），“猪哥”，客家话指公猪。“牵猪哥”者赶着勇猛的公猪进入猪寮与发情的母猪交配，希望透过强壮的公猪，孕育出健康优良的下一代。“牵猪哥”者的手里总会拿着一根细长的竹干吆喝，让“猪哥”顺利的完成其任务。自从兽医懂得人工授精，这项行业也已划上了休止符。

第二节 叶德来与吉隆坡的开发

吉隆坡 (Kuala Lumpur) 简称“KL”，吉隆坡的开发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目前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兼最大城市，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三个直辖区之一，其地理位置在雪兰莪州之中，马来亚半岛中央偏西海岸。吉隆坡面积达 243.65 平方公里，市区人口 150 万左右，连同巴生河流域的人口约有 400 万。⁶⁹吉隆坡是华人的主要传统聚居地之一，到 1970 年时，华人仍占吉隆坡人口的多数，现在华人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42%，为当地主要族裔之一。吉隆坡地名之由来有好几种说法，较为可信的说法则有四种，第一种说法认为 Kuala Lumpur 的来源是马来文的文字，“Kuala”在马来文的意思是“河口”，“Lumpur”则是“淤泥”，⁷⁰这是因为吉隆坡的开阜于鹅麦河 (Gombak) 与巴生河 (Klang) 的交汇处；第二种说法则认为是马来文的“渡口”“Pengalan”，因为华人发音不准，念成 Kelan，而后再演变成 Kuala，最后和客家话“滥芭”合起来，⁷¹遂成此名。⁷²第三种说法则是指马来语 Kuala (河口) 和客家话“滥芭”的组成。⁷³第四种说法是许云樵的论解，许云樵认为当时叶德来带着一群客家矿工在这一带开采锡矿，那时他们称吉隆坡为 Klang，(吉隆坡地名于 1870 年左右才开始应用)⁷⁴客家人写起来，便作“吉隆”。当这一带逐渐热闹起来成为一个小镇，他们便给它加上一个“坡”字，其实就是“埠”字的讹别。⁷⁵

⁶⁹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吉隆坡)，<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2 年 4 月 18 日。

⁷⁰陈亚才主编：《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2006 年，页 2。

⁷¹“滥芭”：客家方言，意思是泥泞沼泽地。

⁷²陈亚才主编：《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页 3。

⁷³陈亚才主编：《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页 3。

⁷⁴陈亚才主编：《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页 2。

⁷⁵许云樵：《马来亚丛谈》，新加坡：青年书局，1962 年，页 20。

纵观以上四种不同的说法，本文将偏向于采信第四种说法，因为这存在于当事人的记忆中，同时也是亲身的体验。1970 年代居住在吉隆坡郊外（如旧街场、沙登新村等）的华人，每当他们说“落坡”⁷⁶、“下坡”⁷⁷，即是去吉隆坡市区的意思。为了确认这段叙述的真实性，走访了一位居住在八打灵（早期住在旧街场）72 岁的老太太（何丽琼，广东人），至今她还是经常说“落坡”。同时，亦向居住在沙登新村 47 岁的会计师（许秀容，客家人）求证，她告知他们兄弟姐妹还是用“下坡”一词；据她所知，沙登新村 50 岁以上的居民都还是惯用“下坡”一词。笔者本身（63 岁）也不例外，当遇上年龄不相上下或年长者，很自然的会用上“下坡”一词以告知对方要去吉隆坡市区。许云樵的解释较为恰当，追溯吉隆坡名称之由来，即可理解早期中国人南来马来亚的一段历史渊源。⁷⁸当时客家矿工的教育水平，一般上都相当低，有者甚至是文盲，因此极有可能把“埠”误作“坡”。吉隆坡的开埠与社区形成和南来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当中又以客家人的角色最为重要。叶德来为惠州籍客家人，作为开埠功臣和重要矿家，他大量引进客籍矿工，使客家人对吉隆坡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主导吉隆坡开埠的功臣是吉隆坡的五位华人甲必丹：（第一任：邱秀（不详-1863）；第二任：刘壬光（不详-1868）；第三任：叶德来（1837 - 1885）；第四任：叶石（不详-1889）；第五任：叶观盛（1846 - 1901）。表 5 清楚列明了吉隆坡的五位华人甲必丹的任期：

⁷⁶ “落坡”：广东方言，意思是去吉隆坡市区。

⁷⁷ “下坡”：客家方言，意思是去吉隆坡市区。

⁷⁸ 马来亚（由马来半岛的十一个州组成）从 16 世纪初开始先后落入西欧三个列强国的手中，成为葡萄牙、荷兰及英国的殖民地。马来亚于 1957 年 8 月 31 日从英殖民地取得了独立，并定都吉隆坡。而马来西亚是于 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由马来亚（Federation of Malaya）、新加坡、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组成。然而新加坡于 1965 年 8 月 9 日脱离马来西亚，自成一国。一般人都以为 Malaya 是由 Malay 加上 a 字而成。根据许云樵的研究结论，Malaya 其实是一个字，这个字是南印度的淡米尔语词，意思是山。

表 5：吉隆坡历任甲必丹⁷⁹

历任	姓名（生卒年）	祖籍	任期
第一任	邱秀（不详-1863）	广东惠州	1859-1862
第二任	刘壬光（不详-1868）	广东惠州	1862-1868
第三任	叶德来（1837-1885）	广东惠州	1868-1885
第四任	叶石（致英）（不详-1889）	广东惠州	1885-1889
第五任	叶观盛（1846-1901）	广东台山赤溪	1889-1901

贡献居功最大者叶德来。叶德来还未开发吉隆坡之前，这一地带原是乏人问津的沼泽森林，然而这片沼泽地带在经过叶德来的领导与开发下，吉隆坡早期市镇的雏形逐渐扩大与形成。本文将仔细分析客家人移居马来亚的原因，同时也会详尽叙述客家人在吉隆坡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以及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在了解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之余，也将更好地掌握当时客家先辈所面临的挑战及披荆斩棘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的艰辛过程。

叶德来作为重要矿家以及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对于吉隆坡的经济开发以及社区发展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西方学者古力克（J.M. Gullick）在他的著作《吉隆坡早期的故事》（*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以及《吉隆坡，1880-1895》（*Kuala Lumpur, 1880 - 1895*）里对甲必丹⁸⁰叶德来开发吉隆坡的肯定与赞赏。⁸¹在这两本著作中有许多阐述叶德来的功绩⁸²以及欧洲观察家对他的好评：

⁷⁹黄文斌：〈论析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客家人的参与（1859 - 1920）〉，页 104。

⁸⁰“甲必丹”为拉丁文字（L.L.）capitaneus（意思是首领），源自于拉丁文字（L.）caput（首长的意思）。

⁸¹笔者援引西方学者对叶德来的评语，主要是参照了多家评论后觉得 J.M. Gullick 的说法较为客观、不带偏颇。

⁸²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8.

“将近二十年，这位充满活力的华人矿工（叶德来）保卫、重建及发展了吉隆坡。”⁸³

“在内战（1869-1873）过去的数月中，一场大火把这新殖民地（吉隆坡）夷为平地，要不是叶德来勇敢的决心，吉隆坡不可能重建起来。”⁸⁴

吉隆坡具有今天的规模有赖于吉隆坡一带的地区蕴藏大量的锡苗。从 1851 年至 1989 年，马来亚的锡产量一直保持世界排名第一，年产量约介于 30,000 长吨至 80,000 长吨（1972 年起以公吨，Metric Ton）计算。在日治及光复时期（1942-1947）受到严重的损失，马来亚的锡产量一年不及 16,000 长吨。自 1991 年始至 2000 年，中国跃升为世界锡产量最高的国家。⁸⁵从 1851 年至 1989 年，锡确实是马来亚的经济命脉，而这命脉的支柱有赖于客家人的开拓与努力。

吉隆坡的开发始于十九世纪中叶，雪兰莪巴生统治者拉惹鸭都拉（Raja Abdullah）的前来探测锡苗。拉惹鸭都拉和拉惹朱玛亚（Raja Juma'at）两兄弟说服了马六甲商人徐炎泉（Chee Yam Chuan）与林西河（Lim Say Hoe）贷款 3 万元让他们在巴生河上游探测锡苗，⁸⁶并于 1859 年成功的在暗邦（今称安邦）发现了锡苗。⁸⁷吉隆坡的开发不但与锡矿开采业有关，更与吉隆坡的五位华人甲必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五位华人甲必丹治理、重建与发展吉隆坡前后共 43 年之久。这五位华人领袖甲必丹都是客家人。五

⁸³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this dynamic and masterful Chinese miner had defended, reconstructed and developed Kuala Lumpur.” 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 - 1895*, pg. 8.

⁸⁴ “It was destroyed by fire during the last months of the Civil War and might never had been restored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e courageous determination of Yap Ah Loy. 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Singapore: Donald Mose, 1956, pg. 1.

⁸⁵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 215-218。

⁸⁶ 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12.

⁸⁷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页 19。

位甲必丹之中，功绩最为显著以及贡献最大者为叶德来，因他在位长达十八年之久，也是五位之中任期最长的一位甲必丹。

甲必丹制度大抵滥觞于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统治马六甲后。⁸⁸葡萄牙政府委任一位华人领袖代行治理华人社区事务，并授予“甲必丹”头衔。甲必丹也是华人审理案件的司法官。此后，荷兰人统治马六甲及印度尼西亚，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以及英国人统治马来亚的初期，都沿用了甲必丹制度。直至吉隆坡第五位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去逝后，吉隆坡甲必丹制度被取消，英国殖民政府全权掌握政权直至 1957 年马来亚才取得独立。

中国客家移民抵达马来亚后，大部分从事开采锡矿业，客家矿工主要由两条路线进入矿区，一是从马六甲至卢骨、双溪乌戎、吉隆坡、安邦一带，矿工以惠州籍客家人为主。另一条路线则是经槟榔屿进入霹雳州拉律及近打谷（Kinta Valley）矿区，这里的矿工则是以嘉应客家人为主。叶德来也不例外，当他于 1854 年抵达马六甲后，有赖于族亲叶国驷（Yap Ket Si）的协助，在榴莲东葛（Durian Tunggal）觅得矿工一职。⁸⁹叶德来的人生转折点在他认识了叶亚石（Yap Ah Shak）和刘壬光之后，正如古力克在他的著作《吉隆坡早期的故事》里所言：“他们的友谊让叶德来在这世界的舞台上开始展露头角”。⁹⁰

⁸⁸叶华芬：〈马六甲华人史〉，张清江：《新马华人史译丛》，新加坡：陈孟哲，2007 年，页 66。

⁸⁹黄贤强：〈叶亚来从平凡移民到不平凡的领袖〉，何启良主编：《匡政与流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3 年，页 6。

⁹⁰“These friendships were the beginning of Ah Loy’s rise in the world.” J.M.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18.

1860年，双溪乌戎的马来酋长为锡矿控制权而展开械斗。此地区的华人甲必丹盛明利不幸在这场械斗中被杀。华社推选叶亚石接任甲必丹一职，但他不接受，反而推荐叶德来出任甲必丹。这说明叶德来的才干得到赏识。如古力克在《吉隆坡早期的故事》里也这么称赞道：“他天赋的领袖与组织才能得到认可。”⁹¹叶德来在抵达马来亚之后短短的七年之内，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年青移民，一跃而升为华社的领袖，当时叶德来才24岁。他凭着个人的实力、加上时机的出现以及人事的促成而成为华人移民的重要领导人，这可能就是中国人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1862年，叶德来应当时已任吉隆坡第二任甲必丹刘壬光之邀，出任经理管理锡矿业务，同时兼任他的私人助理协助政府事宜。在这段时期，叶德来开始自己创业，他拥有两家锡矿场及一间中药店（德生号）。自此，叶德来便飞黄腾达。

“他（叶德来）于1862年来到吉隆坡。从1862年至1880年，吉隆坡的故事也就是叶德来的故事。”⁹²

“叶德来是吉隆坡实际总督。几乎所有吉隆坡的建设都应感恩于叶德来的策划与他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⁹³

以上是古力克对叶德来开发吉隆坡的肯定。当他的事业正上了轨道，却卷入了马来酋长东姑姑丁（Tunku Kudin）和拉惹马地（Raja Mahdi）争夺锡产量的税收权而爆发了雪兰莪内战。雪兰莪7年的内战（1867年至1873年）结束后，吉隆坡几乎近似一片废墟，影响最为严重的是经济命脉的锡矿业。由于内乱时期停止生产，吉隆坡地

⁹¹His gifts as a leader and organiser were becoming recognized. 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19.

⁹²“He came to Kuala Lumpur in 1862. From then until 1880 his story was Kuala Lumpur’s story.” 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33.

⁹³“Ah Loy is the governor of Kuala Lumpur. Almost everything in it owe something to his direction and energy.” 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67.

区的锡矿场变成泥浆湖泊；所有开采锡苗的机器如蒸气机和离心泵（沙泵）及其它器械全被毁坏，最为棘手的问题是缺少矿工。叶德来在无计可施之下，唯有向英商、新加坡和马六甲华商举债以重振锡矿业。⁹⁴远处如芦骨、拉沙、双溪乌戎的矿工听闻叶德来吉隆坡的锡矿将恢复生产，都相拥而至，以往雪兰莪内战时期的战士也加入矿工行列，⁹⁵叶德来甚至远至中国引进劳工。到了 1875 年杪，叶德来的矿工人数已达 6000 人。自 1875 年至 1878 年，由于锡价偏低，叶德来除了苦撑着维持现有的锡矿场外，同时也努力的扩充业务。直至 1879 年锡价暴涨，⁹⁶叶德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到了 1880 年，叶德来拥有的锡矿大约是雪兰莪锡矿总数的一半。⁹⁷1881 年，具备远见胆识与冒险精神的叶德来从外国买进第一台蒸汽机（steam engine）。他把这台蒸气机运至安邦这一最大的锡矿场使用。这可说是雪兰莪州内锡矿场使用的第一台蒸气机。⁹⁸自始，这锡矿场的产量大大提高。

叶德来是位有远见的企业家，他把投资风险分散，他多方面的扩充业务，包括砖窑、石灰窑、养猪场、熔锡厂、采石厂、茨厂，⁹⁹大规模开垦与种植木薯。¹⁰⁰另一方面，为了可以为自己的锡矿场供应价格更合理的米粮，他鼓励马来人在吉隆坡巴生谷一带耕种稻米。¹⁰¹到了 1878 年，全安邦谷（Ampang Valley）都是稻田。1885 年，种稻的范围扩充到吉隆坡郊外如文良港（Setapak）和峇都（Batu）。¹⁰²1878 年，叶德来

⁹⁴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15-16.

⁹⁵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61.

⁹⁶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16.

⁹⁷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33.

⁹⁸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55.

⁹⁹目前吉隆坡茨厂街的命名源自叶德来在此建立茨厂。李业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7 年，页 138。笔者认为早期此地区都用茅或苇盖屋子因而得名。

¹⁰⁰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33.

¹⁰¹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63.

¹⁰²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59.

又以 2000 元投资种植西米 (sago)，他聘请马来人在吉隆坡与白沙罗 (Damansara) 之间的 12000 英亩的地段种植西米 (sago)。¹⁰³

1881 年 1 月火灾后，叶德来迅速的把烧毁的屋子以泥墙和编条柳栅重建起来，¹⁰⁴但屋顶用的材料还是亚答。因此，同年 12 月的一场大水灾再次把许多屋子摧毁，叶德来的屋子也在这场大水灾里被水冲倒。¹⁰⁵依据古力克 (J.M. Gullick) 的说法，瑞天咸 (Frank Althestorne Swettenham) 于 1882 年出任雪兰莪第三任参政司，他上任后马上着手计划重整吉隆坡市容，包括拆除全部现有的木板屋，而以砖瓦重建。瑞天咸于 1884 年制定条规，无论重建或新建的房子都必需以砖瓦建造。¹⁰⁶在这条规还未实施之前，在这一年里 (1884 年)，吉隆坡增加了 200 间房屋，只有四间的屋顶是瓦盖的。¹⁰⁷吉隆坡的半数屋子都属于叶德来所有。¹⁰⁸叶德来于 1883 年完成重修吉隆坡中央巴刹。¹⁰⁹叶德来还未及响应瑞天咸的砖瓦房屋计划，便与世长辞了。叶德来卒于 1885 年 4 月 15 日，享年 48 岁。出殡之日，参政司罗爷 (John Pickergigill Rodger) 及吉隆坡全体人民都来送行。罗爷向新加坡的总督报告时说：“叶德来的去世，政府失去了一位最能干与忠诚的官员；我本身却失去了一个我真实喜欢和尊敬的朋友。”¹¹⁰

叶德来大力推动吉隆坡经济的发展，致使吉隆坡市镇的雏形逐渐扩大与形成。叶德来推动的项目所带来的经济繁荣都得归功于他。吉隆坡第三任参政司瑞天咸对叶德来掌管吉隆坡的表现，以及叶德来所推动的经济发展项目都赞不绝口。¹¹¹

¹⁰³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58-59.

¹⁰⁴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71.

¹⁰⁵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39.

¹⁰⁶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39.

¹⁰⁷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40.

¹⁰⁸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73.

¹⁰⁹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42.

¹¹⁰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34.

¹¹¹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1895*, pg. 33.

第三节 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

移居马来西亚的最早华族移民是那一个籍贯，早已无从考察，但是客家人聚居在矿区却形成早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马来亚华人聚落的一个重要特点与模式。这种聚落模式，是从聚族而居延伸下来的。

另一改变了客家人命运的原因可说是客家先民的多次迁徙与流动。多次的迁徙与流动，形成了客家人“自强”、“自尊”、“自主”的性格，也正因为长期的迁徙与流动造成了客家人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精神。¹¹²客家移民抵达马来亚之后，这种群体意识既展现出来。当客家移民只身抵达马来亚，聚族而居不能成立，他们唯有退而求其次的与同一祖籍的移民聚居一处，形成客家人的社会群体。其他促使客家人与同一籍贯的移民聚居一处的原因。一是客家人在马来亚华人族群中属于少数（十九世纪时期），二是身处新环境及人地生疏，难免会产生不安与恐惧感。为了达到互助互济，于是乡领带领着同乡们组织起来成立寺庙、会馆、私塾、医院、义山等。

一、寺庙

客家民间信仰学者汪毅夫依据文化人类学者李亦园对宗教的分类，把宗教归为两大类。即“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和“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¹¹³客家民间信仰有天、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先贤崇拜；“客师”

¹¹²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96-97。

¹¹³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1。

与客家巫术；客家住区的俗神和俗佛等。¹¹⁴这些客家民间信仰都属于“普化宗教”。越洋而来的移民来到人地生疏的异地，生活困苦、举目无亲，因此他们迫切寻找心灵和精神上的慰藉。初到此地，还未有能力建庙之前，他们所供奉的神祇很可能是从家乡带来的小尊的观音、大伯公、关帝公等神祇。他们即把神祇安放在神龛上供自己及同乡一起膜拜祈求保佑与指引。同乡首领稍微有了经济能力，即带领同乡筹建神庙。

吉隆坡有史可考最早的一间华人寺庙是“仙四师爷宫”。仙四师爷宫位于吉隆坡闹市中的敦李孝式路（Jalan Tun H. S. LEE，中文旧称为“谐街”，但外文名称曾两度更名，早期为 High Street，后易名为 Jalan Bandar，再改为 Jalan Tun H. S. LEE 沿用至今），设立于 1864 年。仙四师爷宫的创建与叶德来有着密切的关系。1860 年，芙蓉两敌对派的马来酋长为了争夺锡矿税收权而发生械斗，身为芙蓉甲必丹的盛明利被卷入其中。刘壬光与叶德来当时分别担任盛明利的正副队长。盛明利不幸死于械斗中。甲必丹盛明利的旧部属为了纪念盛氏，以叶德来为首于 1861 年在芙蓉拉沙建立了一间祭祀盛氏的千古庙。幸免于难的叶德来被叶亚石推荐出任甲必丹。1862 年，叶德来应好友吉隆坡甲必丹刘壬光之邀往吉隆坡发展。到了 1864 年，叶德来已是两个锡矿场的矿主及一间药材店“德生号”的东主（Chop Tet Seng）。¹¹⁵叶德来为酬答仙师爷神恩亲往芙蓉千古庙，恭迎仙师爷盛明利之神位回吉隆坡，并安置于一所房屋内供奉，称为仙师爷庙。¹¹⁶

¹¹⁴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页（目录）。

¹¹⁵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19.

¹¹⁶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考〉，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仙四师爷庙，1989 年，页 72-73。

仙四师爷庙大殿供奉着两尊主神，即仙师爷和四师爷。¹¹⁷仙师爷指的是盛明利，这已是无可争论的史实，并广为史学界所接受。至于四师爷究竟是谁，本地学者却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是叶四，有的却认为是钟炳来（又称钟来与钟炳），至今还未有定论。认为四师爷即钟炳来的可能性较大，原因如下：

（一）诚如张晓威的论述：一、仙四师爷庙于农历七月七日的四师爷诞辰祭祀，正是以钟炳来的生日为依据。¹¹⁸二、根据〈四师爷钟公传略〉一文的记载，四师爷即钟炳来。¹¹⁹三、两位主神皆扮演着类似“师爷”的角色与功能。称钟炳来为“师爷”，实不为过。而叶四只是一名锡矿矿主及商人。四、吉隆坡惠州客与嘉应客两帮敌对帮会涉及了雪兰莪的内战。钟来（嘉应人）是叶德来此场内战倚重的军事干部，他的英勇善战屡立奇功，但钟来不幸在光复吉隆坡前去逝。战事结束后，叶德来为了抚平两帮客家人的情绪，在供奉盛明利为仙师爷外，亦将出身嘉应的钟来入祭，尊为四师爷。叶德来此举，若是做为客家方言群的和解与团结的象征，并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因此，四师爷指的该是钟炳来。¹²⁰

（二）〈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考〉文中论述，四师爷为钟炳来者。仙四师爷庙之建筑凡三座，正厅大殿、居中神龛，奉祀仙四师爷像，仙师爷盛公居左，四师爷钟公居右。¹²¹

（三）〈四师爷钟公传略〉一文指出：

¹¹⁷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考〉，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 73。

¹¹⁸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考〉，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 75。

¹¹⁹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四师爷钟公传略〉，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 85。

¹²⁰张晓威：〈华人方言群的消长与帮权政治的发展：以十九世纪末的吉隆坡华人社会为探讨中心〉，郑文泉、傅向红编：《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关系》，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9年，页 31-32。

¹²¹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考〉，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 73。

“在钟公策划指挥之下，由巴生反攻吉隆坡，不需三天，一鼓而下，奠吉隆坡永保太平康乐之伟业，若论功行赏，功居第一，惜大局甫定，未获封赏，竟已积劳成疾，溘然与世长辞，梁榘木怀，伟人淹忽，昌胜轸悼，甲必丹叶德来为纪念其生前协助绥靖地方，劳苦功高，特于兴建仙师庙时，雕刻钟公神像，与仙师爷盛公同时陞座，供奉于本庙之正厅，让后人瞻仰膜拜，永亨回时之祀典，故本庙曰仙师四师宫焉。”¹²²

仙四师爷庙真正的庙身始建于 1873 年，并于 1875 年开光进香。¹²³这说明钟炳来卒于 1873 年，四师爷的神位立于钟炳来去逝之后。由上观之，四师爷该是钟炳来。

（四）先贤崇拜，由来已久，如明代归化（今明溪县）知县杨缙《归化县新创乡贤、名宦祠堂序》谓：

“追崇乡贤、名宦，所以厚风俗之劝，扶世教之助也。我朝列圣膺历数以来，布命天下司、府、州、县各立乡贤、名宦祠，以尽崇德报功之典，猗欤体哉！其有意于风俗之厚，世教之扶也何大矣乎？故凡名公奉命来巡按者，承宣德意，惓惓以是为首务。”¹²⁴

“宦曰名，乡曰贤，宦则德政劳绩皆可祀，乡则独重德行也。名宦、乡贤受后人奉祀，因而得统称为先贤。先贤崇拜属于鬼魂崇拜之一种。”¹²⁵

¹²²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四师爷钟公传略》，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 84-85。

¹²³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考》，《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 73。

¹²⁴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页 114。

¹²⁵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页 114。

有关叶四的个人资料似乎很少。《雪兰莪叶氏宗祠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特刊》里的先贤列传文章精粹一栏没把叶四列入栏内。仙四师爷庙供奉的两尊主神，仙师爷及四师爷，是属于“先贤崇拜”。因此，四师爷指的该是钟炳来。

（五）Wan Ming Sing 以英文书写“Yap Ah Loy And Hsien Szu Shih Yeh Miao”（〈叶亚来与仙四师爷庙〉），文中指叶德来与盛明利、钟来为结拜兄弟。四师爷即钟来。

“1864 年，叶德来为了纪念和供奉著名的双溪乌戎甲必丹盛明利（结拜兄弟）而建立了位于吉隆坡中心的仙四师爷庙。过后，叶德来为了纪念既忠诚又勇敢的队长钟炳来（结拜兄弟）生前协助平定 1870 年至 1873 年吉隆坡的内战，叶德来把钟炳来神龕供奉在仙四师爷庙。”¹²⁶

叶德来于 1873 年兴建仙四师爷庙，是以供奉仙师爷和四师爷为出发点，基于酬答他们的恩谊和功绩。这显示出叶德来的为人不但讲义气、重情谊，更是一个饮水思源，有恩必报的人。从另外一个视角往深一层探讨，叶德来兴建仙四师爷庙背后目的就如张晓威所说：一是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神权”，二是通过“神权”建立一个“绅权”；三是结合“神权”与“绅权”以供其领导一帮，同时也可达致跨帮地位与力量，而后展现“帮权”的力量。¹²⁷

¹²⁶Wan Ming Sing, “Yap Ah Loy And Hsien Szu Shih Yeh Miao”,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资料, No. Penerimaan:1957/0001748, No. Fail:91/82.

¹²⁷张晓威：〈华人方言群的消长与帮权政治的发展：以十九世纪末的吉隆坡华人社会为探讨中心〉，郑文泉、傅向红编：《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关系》，页 28。

宗教与民间信仰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上的基本需求而产生的。民间信仰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长盛不衰。民间信仰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它起着安定社会的作用。人们信仰崇拜的原因在于避灾祈福、疏散心中困扰及家庭和社会的纠纷。人们在无能为力解决困惑时，往往会祈求神明的指引，以期得到援助、救济和保佑。民间信仰是跨族群的。许多方言族群都崇拜关羽、妈祖、财神、土地神等。寺庙是方便来自各方言群的人们融入社会的场所，并且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尤如“四公纪念碑”碑文所言：

“溯自建立本庙之意，原以当日尚无界限之公共集会场所，则庙堂尚矣，此前人最苦心之擘划也。”¹²⁸

寺庙不但为善信们提供了精神支柱崇拜的场所，同时也扮演着社会福利的角色。以吉隆坡仙四师爷庙为例，根据庙务记录，早在1915年3月开始，仙四师爷庙即定期每月拨款各三百三十四元一角予同善医院和尊孔学校，¹²⁹以及不定期的拨款予多间学校、同善医院及其他机构。仙四师爷庙在推动与赞助教育方面也不落后，它于1968年分别增设了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大学奖学金¹³⁰和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华文独中奖励金。¹³¹

社区里的寺庙有其存在的意义，它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不可否认的，寺庙一般都会定期举办祭祀、神诞等节日庆典，这些活动不仅能团结族人，更跨族群地将当地居民凝聚起来，促进当地居民间的感情。寺庙举办的活动也无形中丰富了当地居民的

¹²⁸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四公纪念碑〉，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98。

¹²⁹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历年庙务记略〉，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176。

¹³⁰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167。

¹³¹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页171。

生活，让众人能在工作紧绷的生活中松懈下来，同时亦可在活动期间与其他人互相交流、交换讯息。当时英殖民政府将权力下放，让华人甲必丹治理华人社区的事务，但华人一般都会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等思维来警惕自己和身边的人，所以寺庙的存在，在道德行为的准绳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

二、医院

根据古力克《吉隆坡早期的故事》里的叙述，叶德来是设立中医“留医所”（Sick-house——“hospital”）的先驱。叶德来早在 1879 年或之前，即在吉隆坡谐街设立了“留医所”以供患了蚊症及其他热带疾病的矿工休养。相信留医所是叶德来的一间房屋。当年所有的锡矿场每杀一头猪，都得交纳一元给叶德来以资助“留医所”的经费。由于驻诊医师疏忽管理，“留医所”的环境与卫生条件欠缺人意。¹³²这“留医所”很可能于 1883 年关闭，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于 1883 年在吉隆坡建立了第一间医院——Tanglin Hospital（东陵医院）¹³³。二或是管理方面未臻完善。

有关此间东陵医院的建筑费，当年吉隆坡的华人出资不少，特别是客家人。在国家档案馆寻得叶德来给予英殖民政府的一封回函。内容大意如下：

¹³²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67 & 72.

¹³³S. M. A. ALHADY,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Surgery In Malaysi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urgery, Volume 48, Issue 4, August 1978, pg. 352.

“今天收到有关建造一座新医院的来函。我已见了多位大老板，他们都会认捐。我正准备一封通知书给吉隆坡所有的商家，让他们也认捐。”¹³⁴

1889 年东陵医院扩充为中央医院，与此同时，英殖民政府在文良港建造医院，即今日的中央医院现址。¹³⁵东陵医院现已改为东陵社区诊疗所（Tanglin Community Polyclinic）。大埔同乡于 1878 年成立“茶阳公司”（1913 年，在社团法令下改以雪兰莪茶阳会馆注册）。于同一年在馆内附设“回春馆”，¹³⁶为贫病交加无依靠的同乡提供留医所。这是吉隆坡客家人会馆设立的第一所留医所。大约在 1890 年，吉隆坡遇上瘟疫，“回春馆”在数日内，先后死了 7、8 人。为了市民安全起见，政府下令焚烧“回春馆”，馆务因此停顿。直至 1909 年在半山芭“茶山园”重新建立茶阳回春馆。然而，1932 年政府以“回春馆”的环境卫生条件不尽完善为由，下令必须另行建造符合医院之馆舍，并须有合格医生监督医务，方准续办“回春馆”。当年因欠缺经费，只好停止服务直至二次大战后。¹³⁷从 1959 年开始，“回春馆”即改为施诊所直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才告暂停，原因是还未物色到适合的医师。¹³⁸

另一间值得一提的设立在苏丹街的“培善堂”，“培善堂”是吉隆坡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华人甲必丹叶观盛于 1881 年创建。“培善堂”除了施增医药以外，还为孤苦无依的死者施棺助葬。他独资维持培善堂 13 年之久，并于 1894 年改为华社共同

¹³⁴ 〈1881 年 7 月 24 日，叶德来致英殖民政府的一封回函〉，马来西亚国家档案资料，No. Penerimaan:1957/0001748, No. Fail:91/82。

¹³⁵ S. M. A. ALHADY,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Surgery In Malaysia*, pg. 352.

¹³⁶ 特刊编辑小组编：《雪隆茶阳（大埔）会馆 125 周年及茶阳回春馆 124 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隆茶阳（大埔）会馆，2002 年，页 58。

¹³⁷ 特刊编辑小组编：《雪隆茶阳（大埔）会馆 125 周年及茶阳回春馆 124 周年纪念特刊》，页 58。

¹³⁸ 受访者：陈小姐，访问者：林丽华，时间：9-5-2011（下午 2 时 30 分），地点：吉隆坡茶阳（大埔）会馆。

资助的同善医院。“同善”是以取“善与人同”之意。¹³⁹创建期间，陆佑领先认捐一千元，叶观盛则捐出位于茨厂街门牌 73 号的店屋以资助同善医院的开销。直至今日，华社也没辜负先贤创办的为善精神。目前同善医院继续给予穷苦大众特别优惠的医疗费，同时也为孤单死者办理殡葬事宜及为灾难急赈筹款。¹⁴⁰同善医院至今已发展成中西医楼及护士学院。不再分帮派，不分种族与宗教，一视同仁的为病患者服务。客家人的互助精神在这里显露无余，这种互助精神已跨越族群、种族与宗教。

三、会馆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组织之多冠全球。跟据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的数字，截至 2001 年 6 月，马来西亚注册社团的总数是 32,268 个，其中华人注册社团共有 7,276 个。¹⁴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是马来西亚华人民间所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简称华团。华团主要有血缘性团体、地缘性团体、业缘性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社会福利团体、联谊休闲团体、教育团体、妇女团体、青年团体、体育团体、互助团体、政治团体等。

血缘性与地缘性组织起源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¹⁴²此类组织可谓出于团结、互助互济、互惠互利。华人移居马来亚之后，他们也理解身处异国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华人唯有当自强才能闯出一翻天地。因此，当时机成熟时，各方言群就成立了各自的地缘性组织——会馆。换言之，会馆是同籍人在客地成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对家乡

¹³⁹黄文斌：《论析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客家人的参与（1859-1920）》，页 113。

¹⁴⁰同善医院 Tong Shin Hospital, <http://tungshin.com.my/>, 2011 年 5 月 20 日。

¹⁴¹刘崇汉：《马来西亚的五邑华社团》，<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3859>, 2011 年 4 月 30 日。

¹⁴²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页 107。

观念的认同的组织，是移民社会中各籍之间互相联系之处。华人在马来亚成立会馆并非创新，会馆之成立可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在海外的延伸。诚如古力克所说：

“在叶德来的家乡，就有互助互济的会社、社团——以资助维持宗祠及寺庙，协助殡葬费用等。华人在马来亚也成立类似功能的社团组织以协助那些没有朋友的同乡移民。”¹⁴³

会馆是加强团结同乡的重要据点。如果没有会馆，推动团结与互助扶持的行动难于执行，效果也肯定不会理想。由于十九世纪时期资讯网络不发达，因此，会馆是当年华人移民维持与故乡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是协助同乡融入当地社会。从别个视角来审视，会馆扮演着政府机构和公共福利部门的种种功能。会馆不但照顾同乡的老病死，也协助华人族群维持社会的法律与治安。换言之，会馆协助调解族群及帮派内外的纠纷。人们更力求通过会馆“联络商情，敦睦乡谊，团结乡亲，以达互助互惠之益处”。¹⁴⁴具体地为同乡排除困难、调解纠纷、代申冤屈、抵御外侮、寻找职业以及病亡相助等。¹⁴⁵会馆与宗祠的功能有相似之处。宗祠是家族团结的核心；而会馆却是各方言群团结的核心。宗祠是集会议事的公共活动场所；会馆是各方言群的集会议事活动场所。宗祠和会馆（十九世纪时期的会馆）都附设学堂。

客家人在马来西亚被认为是最早成立地缘性组织的方言群。客家人于 1801 年在槟榔屿成立了嘉应会馆。客家人有云：“天下客家是一家”¹⁴⁶、“宁可卖祖宗田，不忘

¹⁴³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pg. 22.

¹⁴⁴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年，页 72。

¹⁴⁵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年，页 331。

¹⁴⁶张宇鹏：《客家文化琢磨》，罗勇等编：《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页 210。

祖宗言”¹⁴⁷，这两句话充分反映了客家族群的方言与民系认同意识。客家人之所以成为建立会馆最早的方言群，一、为确保自身生存与发展，善用血缘、地缘关系，建立同宗、同乡相互合作关系的团结精神。二、身为外来移民，居住在异国陌生的环境，必定会产生恐慌与不安。为求生存，必定会互助团结以增进力量。三、长期的迁徙与流动在客家人中形成了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社会风尚，¹⁴⁸也同时磨练出客家人的性格，形成了“自强”、“自主”及“自尊”的文化内核。¹⁴⁹十九世纪参与吉隆坡发展的华人，以来自广东惠州的客家人为主。具备这五项优点，且聚居一处，具有才干领导能力者，即率先组织会馆以凝聚同乡。

会馆不时举办种种不同的活动，除了祭祀祖先、周年庆典、中秋晚会等传统文化活动，也不时举办各项竞技活动，如象棋比赛、挥春比赛、歌唱比赛、烹饪比赛、裹粽比赛、绘画比赛等，有些活动甚至会列为会馆的常年活动，这些活动不但能发掘年轻一代的潜能，更能促进彼此间的感情，加强同乡之间的凝聚力。这些活动的功能与寺庙一样，让大家能聚集在一起，既能让生活更添色彩，又能交换讯息、互通有无。诚如颜清湟所言：

“如果没有会馆的存在，东南亚早期的客籍移民将丧失他们生活的焦点和文化的认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会馆的建立，东南亚的客家族群将不会有足够的力量与工具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目标。”¹⁵⁰

¹⁴⁷李泳集：《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6。

¹⁴⁸李定国：〈客家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继承与发展〉，潘明智编著：《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年，页332。

¹⁴⁹李定国：〈客家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继承与发展〉，页332。

¹⁵⁰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96。

会馆是早期移民团结的象征，吉隆坡其他方言群都在十九世纪末纷纷成立了他们的会馆。如福建会馆成立于 1885 年；海南会馆成立于 1889 年；潮州会馆成立于 1891 年；雪隆茶阳会馆成立于 1878 年；而广肇会馆则成立于 1897 年。发展至今时今日，会馆除了团结与互相扶助同乡之外，还扮演着教育推广中心，如设立大学奖贷学金、中小学奖励金等，同时也是向政府反映华社心声的代表团体之一。会馆为华社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其功能之大及其存在的价值是无可否认的。

四、学校

从文本中对早期华人社区里所创建的寺庙、会馆及医院的论述，可发现一个明显的脉络，即首先创建寺庙，其二是会馆，其三是医院，尔后才创办学校。诚如林开忠所言：

“当移民首次抵达一个陌生地方时，他们会很自然的按照过去在家乡的经验而组合起来。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感的需要，另一面也是适应的策略之一。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迁移到不同的国家时，甚至也在乡村居民移往都市时发生，所以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¹⁵¹

马来西亚早期的华人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延伸，即接受私塾学堂式的教育。这种私塾教育直至二十世纪初叶才被现代小学教育取代。吉隆坡创办于二十世纪初叶的华文中小学校有：尊孔学校（1906 年）、坤成女校（1908 年）、坤成女中（1925

¹⁵¹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出版，1999 年，页 38。

年)、光汉学校(1909年)、中华辟智学校(1911年)、大同学校(1911年)、循人学校(1913年)、循人中学(1955年)、侨南学校(1917年)、中国学校(1917年)、志文学校(1918年)、中华小学(1919年)、中华中学(1939年)。

如从现代华文小学的出现开始为起点,由会馆创办的吉隆坡华文小学有循人小学(惠州会馆创办于1913年)、中国小学(嘉应会馆创办于1917年)、中华小学(福建会馆创办于1919年)、培才小学(潮州会馆创办于1923年)及南开小学(茶阳会馆创办于1949年)。¹⁵²这五间小学,其中有三间是由客家人的会馆所创办,这正是说明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如以私塾教育为例,叶德来是最早于1884年在吉隆坡创办“唐文私塾”并附设于惠州会馆内。

(一) 蟾蜍罗, 咯咯咯, 唔读书¹⁵³, 无老婆。¹⁵⁴

(二) 山鹧鸪, 咕咕咕, 唔读书, 大番薯。¹⁵⁵

这两首童谣是客家长辈给子孙们的忠告。客家人自幼就向子孙们灌输崇文尚学、耕读传家的观念。换言之,是长辈寄望子孙读书仕进。客家人重视教育有其因由,一是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延续了中原的儒家思想——重农抑商、崇德尚学。二是客家人来到赣闽粤的荒山地带,可耕之地不多,加之交通极不方便,造成工商业无人问津。客家先民经历了多次的迁徙,从生活经验里,他们意识到耕耘是求存,至于要改变命运,唯有读书仕进,别无他途。

¹⁵²黄文斌:《论析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客家人的参与(1859-1920)》,页114。

¹⁵³唔:客家方言,意思是“不”。

¹⁵⁴马来西亚嘉联会银禧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嘉联会联合银禧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嘉联会银禧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1976年,页546。

¹⁵⁵杨宏海、叶小华编著:《客家艺韵》,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29。

客家人“耕读传家”可寻之迹也不少。江西石城县岩岭乡上柏熊氏古村，保存下来的明代石门斗，石门斗上刻着“耕读处”三字，其两旁还有对联曰：“力耕可以无饥，开篇自然有益”。¹⁵⁶这印证了客家人亦耕亦读，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在客家土楼中，处处可见无声的家庭教育，在此只引“振成楼”为例，“振成楼”大门两边的石刻楹联：

“振纲立纪，成德达材”¹⁵⁷

此楹联可说是族训，要子孙们遵守纲纪，重视德才，奋发向上。楼内的其他对联如：

(一) 振乃家声，好就孝悌一边做去；

成些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

能不为息患挫志，自不为安乐肆志。

在官无偿来一金，居家无浪费一金。¹⁵⁸

(二)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¹⁵⁹

(三) 言法行则，福果善根。

从来人品恭能寿，自古文章正乃奇。¹⁶⁰

¹⁵⁶罗勇：〈略谈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寻根》2007年第5期，页4。

¹⁵⁷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页22。

¹⁵⁸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页116。

¹⁵⁹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页116。

(四) 振作那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需努力；

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¹⁶¹

联文是无声的教诲，起着提醒、灌输、警策、训诫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为人之道。客家土楼中的对联、楹联及匾额体现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及重教的思想。

(一) 天光唔起误一日，少年唔学误一生。¹⁶²

(二) 养子唔读书，不如养头猪。¹⁶³

(三) 子弟唔读书，好比没眼珠。¹⁶⁴

(四)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¹⁶⁵

(五) 读书肯用功，茅寮里面出相公。¹⁶⁶

以上客家谚语反映了客家人重教的观念。越是贫穷，就越要子孙读书仕进。客家人深信“读书肯用功，茅寮里面出相公”。客家人重教育的传统在客家土楼和祠堂也有所体现，土楼内，设置学堂，在其他地区的民居中并不多见。宗族内更专辟“儒资田”（又称学田、书灯田）¹⁶⁷以助学。有的祠堂也兼作学堂。为了使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客家人除了对晚辈言传身教外，在稍有条件的聚居地就兴办学堂，发展教育。¹⁶⁸几乎所有的客家村落都有学堂。由此足见客家人对子孙教育的重视程度。曾在中国客

¹⁶⁰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页 116。

¹⁶¹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页 117。

¹⁶²罗勇：《略谈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页 7。

¹⁶³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页 277。

¹⁶⁴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页 277。

¹⁶⁵罗勇：《略谈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页 7。

¹⁶⁶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页 277。

¹⁶⁷孔永松、李小平：《客家宗族社会》，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页 96。

¹⁶⁸郭丹、张佑周：《客家服饰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页 4。

家地区宣教二十多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赖里查斯，于 1901 年编写了一本《客法词典》。在该书的序文中，他是这么的写道：

“在嘉应州这个不及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余间的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的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的每个村落都有祠堂，那就是他们祭祖先的所在，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实，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几时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¹⁶⁹

后文将会从早期的教育模式论述至现代教育制度以及循人独立中学与吉隆坡客家人的互动。客家人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深信唯有通过教育才能摆脱贫穷。在马来西亚兴学办校的客家人也不少，叶德来、张弼士、郑景贵、戴欣然、胡子春等都是创办发展华文教育的先驱。

马来西亚境内的私塾有的发展至今日的华小在柔佛州计有：麻坡（Muar）醒华学校、中化小学、巴力苦麻（Parit Bunga）育英学校、巴力巴加（Parit Bakar）启新学校、佳什（Buloh Kesap）佳什学校、笨珍（Pontian）修文学校、新山（Johor Bahru）国光学校、新山辅士学校、宽柔学校、峇株巴辖（Batu Pahat）正修学校、峇株巴辖双溪须汝（Sg. Suloh）永章学校。霹靂州计有：怡保（Ipoh）培南学校、峇眼

¹⁶⁹赖里查斯：《客法词典》，转引自李定国：〈客家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的继承与发展〉，潘明智编著：《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页 334。

色海 (Bagan Serai) 东华学校、朱毛 (Chemor) 培正学校、九洞新村 (Jelapang) 九洞学校、布先 (Pusing) 益智学校、布先喜州 (Gunong Hijau) 喜州小学、实兆远 (Sitiawan) 华侨学校、实兆远甘文阁中正学校、爱大华 (Ayer Tawar) 民德学校、司南马 (Selama) 志成学校、砂拉越 (Sibu, Sarawak) 诗巫光安小学。¹⁷⁰

从私塾发展至小学而后中学的计有：霹雳江沙崇华独中、砂拉越诗巫卫理中学及吉隆坡循人中学。以上所列的小学和中学皆有史可考，可能亦有其他学校也同样由私塾发展而来，可惜遗留下来的资料残缺或佚失，无从考证，是以不列在本文中。

五、义山

《论语·为政篇》，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¹⁷¹ 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生与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寺庙、会馆、医院和学校是解决生者的问题，而义山的存在，则是为了让逝者安息。侨胞客死异乡，不能回归故土落叶归根，要葬身他乡已经是非常凄凉的事，而死后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更是让人倍感悲惨，先贤们每每念及于此，难免心有戚戚然。

吉隆坡开埠於 1859 年，开埠之初，地广人稀，侨胞不幸逝世，草草成殓，随处埋葬，那时候还没有创立“义山”或“公冢”，以供埋葬。当时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侨胞都会把逝世者遗骸埋葬在目前惹兰汉都亚附近国家体育馆及半山芭监狱原址一带地区，变成荒冢累累，跟乡团有关系或其亲属尚在者，在三四年开棺执骨，火化後骨灰置瓮，寄回中国重葬，入土为安，那些无亲无戚者，客死异

¹⁷⁰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 55-67。

¹⁷¹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为政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页 13。

乡，白骨长埋斯地，由於荒冢，孤坟乏人管理，历经雨打日晒，牛羊践踏，野狗扒挖，有的棺木暴露，有的金瓮破损，斑斑白骨，散露荒岗野草间，不忍卒睹。

172

先贤叶德来、叶观盛、赵煜、陆佑及叶致英等有鉴于此，顿生恻隐之心，为了一劳永逸处理侨胞善後殡葬事宜，遂发起成立吉隆坡广东义山，并著手向殖民地政府申请葬地，经过多年的奔波及筹划，终於获得政府首肯，於 1895 年正式宪报公布，拨出吉隆坡语文局路（旧飞机场路）一块 215 英亩地段给义山作葬地，直至 1920 年，另拨地 48 英亩，使本义山吉隆坡语文局路葬地，增至 263 英亩。¹⁷³

义山成立于 1895 年，不过早于 1878 年就已有人葬在这里。1925 年，英国殖民地政府正式批准广东义山为一个合法团体，管理义山坟地。¹⁷⁴广东义山管理层（董事会）由吉隆坡 6 间会馆代表组成，它们是雪隆广肇会馆（6 名代表）、雪隆嘉应会馆（3 名）、雪隆惠州会馆（3 名）、雪隆海南会馆（3 名）、雪隆潮州会馆（3 名）及雪隆茶阳会馆（1 名）。¹⁷⁵义山的成立，对于早期华人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因为它的存在，为逝者保留了他们在世上最后的尊严，让遗体能有个妥善的归属，能够入土为安，除此之外，义山的存在也时刻提醒华裔子弟要保留慎重追远，不忘先人的精神。

吉隆坡的华人义山共有三座：广东义山、福建义山和广西义山。1895 年创建的广东义山拥有 263 英亩的土地，是三座义山中拥地最大的义山。约 1895 年或之后创建的福建义山拥有 148 英亩的土地，如今已命名为：“克拉永路福建义山”。1898 年创建

¹⁷² 〈关于广东义山：广义简史〉，《吉隆坡广东义山》，<http://kfc.org.my/>，2011 年 8 月 17 日。

¹⁷³ 〈关于广东义山：广义简史〉，《吉隆坡广东义山》，<http://kfc.org.my/>，2011 年 8 月 17 日。

¹⁷⁴ 封慧芬报道：〈回应历史：古迹报道系列〉，《星洲日报》大都会，2000 年 7 月 14 日。

¹⁷⁵ 封慧芬报道：〈回应历史：古迹报道系列〉，《星洲日报》大都会，2000 年 7 月 14 日。

的广西义山则拥有 20 英亩的土地，是三座义山中拥有土地规模最小的一座义山。吉隆坡三座义山的总面积为 431 英亩的土地，在寸土黄金的吉隆坡范围中，华人义山多次面对逼迁的压力，华人至今仍然坚持捍卫着它的存在，足见义山在华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和神圣的地位。

义山不仅让死者拥有一块安身之地，它已延伸出另一种文化与功能，从墓碑上所铭刻的文字，如逝者的籍贯、生卒年、姓名、立碑者等等，已成为重要的原始历史资料。通过墓碑上的文字记录，可考证在这片区域不同年代里生活的人口结构，更可进一步推断当时的社会形态。墓碑上铭刻着逝者的籍贯与姓氏更具有深远的意义，籍贯等同于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华人是非常重视自己的“根”的民族，所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早期华人移民普遍上都会有“落叶归根”的心态，希望自己的后裔能铭记着自己的“根”，铭刻在墓碑上的籍贯与姓氏，可说是先辈对于后裔最后的嘱咐，希望能通过这种无声的教诲，让子孙紧记住自己祖先的籍贯、自己的根源。

第三章 吉隆坡华人早期(二十世纪以前)的教育模式

第一节 私塾教育

自春秋伊始，华人就承传了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让华人社会对教育非常执着与重视。华人对教育的重视，更可以从早期南来华人的身上体现出来。本文第二章已阐明了华人南来的因由多为家中贫困，而移民当中大部分的教育水平也只是一般而已，有的甚至是文盲。这些南来的华人更因身受其害，深感教育之重要，于是，当他们的生活稳定下来，经济能力也有所改善的时候，他们便把家乡的传统教育模式延伸至马来西亚，即私塾教育。

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的划分，研究者有其不同的划分。莫顺生的著作《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 - 1999》，其内容涵盖接近六百年的教育起源、发展和演变。并划分为五个阶段¹⁷⁶：一、马来亚独立前的教育概况；二、马来亚独立初期的教育概况；三、马来西亚初期的教育发展；四、马来西亚 80 年代的教育发展；五、迈向资讯科艺教育新纪元。郑良树的四册著作《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划分的很详细；第一册内容涵盖华教的源头至国民教育的延伸；第二册内容涵盖教育与民族主义至日治时期的华教；第三册内容涵盖战火后的华教的发展至民选政府下的华教，包括拉萨报告书与东马的教育白皮书，以及其教育法令所带来的影响与反应；第四册内容涵盖独立后的教育政策至华教在风雨中成长的苦难日子。王秀南的单篇论文〈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作者根据年代来划分：一、1800 年至 1870 年的早期教育 —— 即民间的文化

¹⁷⁶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0 年，页 1、62、85、147、204。

垦荒时期；二、1870年至1941年的战前教育——即政府的接办教育时期；三、1941年至1945年的战时教育——即日本的占领教育时期；四、1945年至1955年的战后教育——即战后的教育重建时期；五、1955年至独立建国的今日教育——即国家的教育创制时期。¹⁷⁷本论文的教育篇章的论述方法偏向王秀南的划分，因本章即是论述十九世纪的教育模式。

马新华文教育的源头真正始于何时，至今还具争议性。有关此问题，有三种说法：一、马来亚的第一所私塾设立于檳城，创办者为大伯公张理，创设于十八世纪中叶，即乾隆(1736 - 1795)初期。据顾因明说“拉氏(即莱特)足履是岛之顷，祇见居民十八人，中有华人三，俱系鱼户。”¹⁷⁸此说法难于被接受，主因是那来学生。二、陈国华认为马来西亚最早的华文私塾为檳城华人创设于1819年的五福书院。¹⁷⁹马来西亚教育家沈慕羽也认为，创设于1819年的五福书院为马来西亚最早的一间私塾。¹⁸⁰廖文辉也如是以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起点始于檳城五福书院。¹⁸¹郑良树却不以为然，因为〈重修五福书院小引〉说：“朔我五福堂者，崇奉重阳帝君，咸丰年间(1851 - 1861)之所建、檳榔志内之所载者也。”碑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目前最古的一块碑刻。另有两个碑〈五福书院创建千益银会碑记序〉及〈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分别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与光绪三十二年(1906)。¹⁸²以这三个碑刻来考量，很明显的显示“堂”在先、“书院”为后，这也正说明五福堂是座神

¹⁷⁷王秀南：〈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宋哲美：《星马教育研究集》，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4年，页1。

¹⁷⁸卜克望(Bookworm)著：“Penang in the Past”，顾因明、王旦华译：《檳榔屿开辟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149。转引自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页3。

¹⁷⁹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文教育三百年1690-1990》，多伦多：Royal Kingsway Inc.，1992年，页11。

¹⁸⁰沈慕羽：〈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奋斗史篇〉，本文宣读于1994年，台湾的东南亚华人教育国际研讨会，屏东：国立屏东师范学院，1994年6月6-8日。转引自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3。

¹⁸¹廖文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1951-2005)》，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页3。

¹⁸²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4。

庙，设立私塾之后易名五福书院。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于 1815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校长为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米勒（William Milne）。书院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华文报刊，即《察世俗每月统纪传》。¹⁸³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资料显示：“至嘉庆年间，英吉利以万古累易之，于是麻甲为英吉利新藩，开英华书院以教唐人与土人，且义学生甚多，男女不论，土藩汉人，皆知读书。”这说明书院内的学生有华人和土人，并且马六甲嘉庆时期已有不少的义学私塾学堂。又据《贸易通志》的记载：“设英华书院，凡中国书籍皆镂板翻译，延华人教其子弟。”¹⁸⁴英华书院翻译中国书籍作为课本，同时聘请华人担任教师及创办华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此观之，英人办校的目的是为了华人学习英语以便协助翻译及刊行宗教书刊；以及让外国人学习中文可了解中国文化，有利于传播福音。因此，郑良树认为英华书院恐怕不是新马华文教育的第一把火炬了。¹⁸⁵

根据郑良树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研究成果，早在十八世纪末叶，马来亚已出现私塾教育。马六甲、槟城及新加坡是最早开发的三个地区，也是南来华人最先聚居落户的地区，最早开办私塾教育的华人社区应是马六甲，接下来是槟城，而后是新加坡。¹⁸⁶私塾最早出现在马六甲的原因，并非马六甲历史较为悠久或华人人口众多，而是与西方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¹⁸⁷据英人传教士米勒（William Milne）的著作《新教传播中国头十年之回顾》文中指出，1815 年期间，马六甲有三

¹⁸³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 6。

¹⁸⁴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 6。

¹⁸⁵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 6-7。

¹⁸⁶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 13。

¹⁸⁷颜清煌著，栗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277。

间华文私塾。¹⁸⁸另一份在 1818 年至 1820 年马六甲出版的教会季刊《印度支那拾遗者季刊》（*Indo-Chinese Gleaner*）的记载，1815 年马六甲有九间华文学堂；一间专让广东人子弟就读，人数约 10 多名。其他八间专为福建子弟设立，共约 150 人。¹⁸⁹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檳城开办了三间华文学堂和一间女校，皆以《圣经》为主要课本。1819 年新加坡开埠，弥尔敦牧师（Rev. S. Milton）在勿拉巴沙律（Bras Basah Road）创办了一间学堂，让华、巫儿童就读。1829 年在甘榜格南与北京街各别设立广东和福建方言私塾；¹⁹⁰据德国籍传教士汤生（Rev. G. H. Thomson）说，位于北京街的私塾以闽方言教学，学生 22 人；另外两间以粤语教学的各别位于甘榜格南（学生 12 人）及北京街（学生 6 人）。

马六甲、檳城及新加坡在十九世纪初叶应该拥有更多的私塾，由以可供参考的资料匮乏，无从考证这时期私塾的数目。虽然如此，如依照华人文化习惯，只要族群里有上学年龄的子弟，族内的首领都会发挥其领导能力，群策群力的开办一所最基本、简单的私塾学堂。在马六甲、檳城和新加坡有史可考的私塾，可谓冰山一角而已。因此，当年的私塾数目应比目前所知的还多。以十九世纪初期华族人口递增状况为依据，早在十八世纪末，马来亚华人聚居地已有简陋的私塾。最早有私塾学堂的地区应该是马六甲，接着是檳城，而后是新加坡；此后，私塾教育逐渐散播至马来半岛各个有华人聚居的角落。¹⁹¹

¹⁸⁸林水椽：〈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 216。

¹⁸⁹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人物研究》中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 年，页 71。

¹⁹⁰王秀南：〈星马汶教育史纲〉，宋哲美：《星马教育研究集》，页 5。

¹⁹¹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 13。

第二节 教育制度

早期的私塾教育可分为三类：一是当地富裕华人专为自己及亲人的子弟设立的私塾，这些富裕家庭聘请教师到家里教授其子弟，此称教馆或坐馆。二是个别教师自己在家招生传道授业，此谓家塾或私塾。这两类教学单位统称为私塾。三是某些社群按一定的规章创办，同时礼聘教师在一个公众场所授课，此类称为义学或义塾。¹⁹²这些传统旧式的教育单位多设立于地下室、附属小屋、阁楼、会馆、宗祠庙宇、医院或简陋的建筑物内。这些场地大多数卫生环境条件极差，空气不流通、光线微弱。¹⁹³然而塾师们却在如此的环境底下，成为马来西亚华教的播种者。

义学或义塾则多为各方言社群所设立。前两类型的学塾更没有单位的名称。换言之，这些教育单位没有统一的协调机构，而是各自为政。这些旧式的学塾教育都是方言教育。既然没有统一的正规制度，教馆或坐馆的事主想必以自身的方言为教学媒介。所以事主礼聘同一籍贯的塾师执教。家塾或私塾的塾师大多会以各自的方言教学。义学或义塾则以自己族群的方言教导族内子弟。因此，该社群会聘请同乡的教师担任。

课程方面，也没有统一正式的课本与科目。一般则以《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帖》、《四书》、《孝经》及书法、珠算等。¹⁹⁴私塾与义塾的

¹⁹²林水椽：〈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16。

¹⁹³林水椽：〈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17。

¹⁹⁴林水椽：〈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17。

主要区别是前者为个别私人开设，而后者为公立。私塾与义塾教育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学生入学无特定年龄。诚如陈育崧所言：

“学塾的制度，自五、六岁开蒙，以至二十岁左右，读完了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所以学生的年龄，有自五、六岁的孩子直至二十余岁的青年。”¹⁹⁵

义学或义塾的规模虽还属于小型，但与私塾教育相较之下，义学或义塾的组织较有条理。例如 1888 年设立于檳城平章会馆的南华义学，在草创期间就拟定了《南华义学条义十五条》，这可能是在众多的义学或义塾中硕果仅存的珍贵资料。分析此十五条南华义学条义，可归纳出下列几点：

（一）塾师

创办者因悉知所谓“上樑不正，下樑歪”之道理，即把有关塾师的条件列为第二条，可见其重要性。塾师的人格、学问、健康、嗜好、工作态度、专业精神、责任感及赏罚等方面，都有所规定及必须遵守。不符合者，一概不予聘请。此种要求改变了塾师的形象。在这之前的塾师，多无专业资格，他们之中有者是落地秀才、算命先生、风水师、江湖医师、书记、书信代写人、村中学就或具备读写能力者。¹⁹⁶

（二）学生

¹⁹⁵陈育崧：〈星马华文教育近百年史绪论〉，王秀南编：《星马教育研究集》，新加坡：南洋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71年，页47。转引自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283。

¹⁹⁶林水椽：〈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17。

学生入学年龄、学习时限、家庭背景、学习态度及人品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学生入学年龄为介于 8 岁至 15 岁；凡富裕家庭须捐助义学，其子弟方得入学；奖赏资质优异且好学的清贫学生；学生如资质只一般，学习时限为 2 至 3 年，好让他人得于入学。学生凡不精进、逃学、不遵守校规者，皆令退学。此多项校规具体化了学生的身份，同时造就了有素质的学生，这是坐馆或教馆及家塾或私塾所难以执行的。

（三）学制

当年的创办者似乎已知小班制之好处——提高教学效果，因此，每班只限 20 人。开学与放假则分别定于正月下旬和十二月中旬；年中只清明及中元节放假两天，如有要事，至多放假三天。上课时间规定：清晨念书、教书，学生上午攻书，下午温习、熟诵和呈交作业；此外，间中若有余暇，则读劝善、因果报应诸书。由此可见，其办学之认真。

（四）课程

资质一般的学生，先读《孝经》和《四书》，然后学习应用文，以备谋生，除此之外，学生还必须学习礼仪、揖让、拜跪、动静、应付等，以期学生懂得忠君、孝亲、敬长。换言之，此两种课程视为等同重要。

（五）督导

塾师必须按时考核学生学习进度与成绩。创办者总理等每月巡视学塾，如表现优异的学生，则酌情奖励；如有怠惰、不受教的学生，则令退学。总理的定期巡视，起着督促塾师的教学态度与效果，还能了解学生的程度。

传统教育虽然办得不尽理想，课程落后，环境与设备更是差强人意，然而，是一种自发性的组织，华人自己创办教育可谓发自民族的内心，更是华人的一种民族性格和文化使然。在完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形式的资助，以及教育家的协助与指导之下，这些教育单位且能散播到华人聚居的各个角落，成为传播华人教育与文化的重要场域。义学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影响至深，对后来华教的规划和发展起着启蒙的作用。有的义学更发展至现代小学，吉隆坡循人小学的前身就是唐文义学。

第三节 吉隆坡最早创设的私塾

从吉隆坡社区的形成，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个脉络，即早期的华人移民首先建立庙宇，接下来是创建会馆，而后是创办学校。换言之，华人南来之后，首先为自己寻找心灵和精神上的寄托，之后成立会馆凝聚同乡以达致互助互惠，然后再为下一代着想——办教育。

客家人在吉隆坡最早成立地缘性组织，叶德来于 1864 年创建惠州（公司）会馆于吉隆坡罗爷街（今称 Jalan Hang Kasturi）巴生河畔，并于 1868 年后迁至吉隆坡茨厂街现址。¹⁹⁷成立该公司的主要目的为接应由中国来马来亚谋生的同乡；为同乡提供

¹⁹⁷雪隆惠州会馆第一—八届执委会编：《雪隆惠州会馆馆史》，页 57。

临时住宿及安排就业。此为惠州会馆的前身。1868年，惠州公司迁至今日的茨厂街（惠州会馆现址）。¹⁹⁸由于南来同乡日增，年幼子弟人数也与日俱增。叶德来在家乡（中国）私塾只念了两年，难免对幼时失学感触良多，并且历尽千辛万苦聚集了雄厚的财富（至1880年，他分别拥有约50巴仙雪兰莪的锡矿及吉隆坡房屋）同时也深刻了解到教育的重要性。

客家人素来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再加上上述的种种因素，促使他于1884年在惠州会馆内创设吉隆坡第一间私塾学堂，并附设在会馆内。1885年1月正式开课，学生只有12人，并从中国惠州聘请清朝举人叶树纲先生担任教学工作。第二年，学生增至50人。¹⁹⁹以此观之，私塾是一所开放式的学堂，也就是说，除了让同乡子弟就读之外，其他籍贯的子弟也可以前来就读。客家人已冲破了不同籍贯宗族的藩篱。此后凡29年（1884年至1912年，1913年改为新式的循人学校）先后在此学塾任教的有黄志光、曾赞廷、涂汉秋、李碧云父子等塾师。叶德来于1885年去世，新任甲必丹叶致英的带领下把简陋的惠州公司改建成中国庙宇式建筑，正式易名为“惠州会馆”。²⁰⁰其后政府接办学堂，易名为“唐文义学”，²⁰¹并增聘徐绍荪执教。²⁰²

中国自中英鸦片战争（1840）及中日甲午战争（1894）战败之后，还得割地赔款等不合理的条约。致使有识之士提倡改革教育以达致富国强兵及走向现代化，光绪皇帝于1898年颁布“国是”诏，令全国进行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式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同时将此项教育改革推广至海外。马来西亚的华人受到此项改革之影响，纷纷

¹⁹⁸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1913-1963年》，页7。

¹⁹⁹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32。

²⁰⁰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1913-1963年》，2011年，页7。

²⁰¹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页32-33。

²⁰²黄贤强：〈叶亚来：从平凡移民到不平凡领袖〉，何启良主编：《匡政与流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页16。

筹办新式学校。²⁰³于是唐文义学于 1913 年改为现代新式华文小学，取名“循人学校”。²⁰⁴

²⁰³林水椽：〈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 217-218。

²⁰⁴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届执委会编：《雪隆惠州会馆馆史》，页 57。

第四章 循人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第一节 私塾至小学时期

二十世纪初叶，新式华校在马来亚陆续出现。雪兰莪惠州会馆前贤不但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同时也觉察到传统学塾与英殖民政府开办的英校和马来学校对比教学方案，即可见其明显的差异，传统学塾已被远远的抛落在后头。在乡贤罗玉、叶春章、罗茂、叶桂林、廖碧泉等人努力的倡导下，1913年，唐文义学终于转型为新式学校，取名“循人学校”。以“循人”命名的由来有二，一，因惠州各县属，汉朝时期为南海郡，隋唐时期改为循州府，直至宋真宗天禧四年始易名惠州府至今；二，取名“循人”，好让同乡知道，这是惠州人创办的学校，意义深远，念起来既好听又顺口；起到饮水思源，承先启后的作用，²⁰⁵这正是客家人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传承。

循人学校创办初期，即借用惠州会馆场所开班上课，聘请林善儒为首任校长（1913-1917），学生人数约7、80人。1933年全球陷入经济大萧条，马来亚的经济命脉——橡胶和锡的价格惨跌，大部分橡胶园坵和锡矿都停止生产，华人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循人学校迫而停办一年。²⁰⁶1934年，惠州会馆成立教育委员会，循人学校才得以复办，先后由邓秉真先生、徐公权先生掌校。1936年董事部改选，由黄伯才出任总理（相等于现在的会馆会长），聘请郑为信出任校长，这一年是循人学校的转折期。在郑校长之前，循人学校只开办一至四年级，1939年迁校后才开办高年组（五及六年级）。郑校长备受爱载、敬重，是一位敬业乐业的校长，他的品德让校董及老师

²⁰⁵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执委会编：《雪隆惠州会馆史》，页57。

²⁰⁶赖兴祥：〈循中校史〉，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届执委会表编：《雪隆惠州会馆史》，页185。

们为郑校长冠上“精明能干，忠诚服务”的美誉。郑校长为了方便吉隆坡近郊的学子前来就读，郑校长即向董事部建议购买校车。此建议得到总理黄伯才的接纳并付诸于行动，惠州会馆和黄伯才总理各赠送一辆校车。循人学校成为雪隆地区当年拥有校车的唯一学校，遂传为佳话，也缔造了历史。²⁰⁷是年，在惠州会馆总理黄伯才领导之下重建会馆，学生无法在馆内上课；黄伯才先生义无反顾地毅然答应把吉隆坡楞伽山他自己私人的园地作为临时校址。他办校可谓不遗余力。既然有校车载送学子上下课，家长们纷纷为孩子们报名就读，学生人数也因此急速地增长，由原来的百余人剧增至四百余人。²⁰⁸

惠州会馆董事部前贤为了巩固学校经费基础，于1938年成立惠侨互助会，章程内明文规定：会员所缴纳之纪念金，除去周年纪念费用，余额悉数拨充循人学校的常年费用。²⁰⁹与此同时，为了一劳永逸解决校地问题，学校董事部积极寻找适宜地段以兴建校舍，获得惠侨互助会拨款1万元，惠州会馆会长黄伯才也慷慨乐捐1万元，购得陆佑路段现校址。1940年，正直拟建新校舍时，黄伯才不幸逝世，郑校长又因被雪兰莪总视学官认为有参与反日行动而去职，建校之计暂时搁置。²¹⁰1941年，官文森接任惠州会馆总理，聘请陈宗嶽先生掌校。1942年至1945年8月为日本占领时期，学校被迫停办。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投降，惠州会馆董事部策划复课，并于是年10月开始招生。旧生于12月在惠州会馆一楼（惠侨互助会会址）复课；新生于1946年在惠州会馆二、三楼上课。桌椅皆由董事潘仕明先生报效。

²⁰⁷林金花：〈飞鸿雪泥——缅怀郑为信校长〉，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1913-1963》，页11。

²⁰⁸赖兴祥：〈循中校史〉，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届执委会编：《雪隆惠州会馆馆史》，页185-186。

²⁰⁹雪兰莪惠侨互助会编：《1965年雪兰莪惠侨互助会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页48。

²¹⁰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1913-1963》，页9。

会馆总理官文森先生重聘前校长郑为信掌校（1945-1950）。²¹¹在郑校长的任期间，1946年他为当年不能进入正规学校的超龄生开办夜学班。²¹²1947年李荣芦接任会馆总理，鉴于会馆位于闹市中，他力倡建校，于陆佑路校址修建临时校舍，为学生提供一清静的学习环境。1950年郑为信校长辞职返乡，由杨继任女士接任校长一职（1950-1954）。1952年，李南燕当选为惠州会馆副会长及循人学校建校委员会主席，获得雪兰莪惠州会馆及惠侨互助会，暨社会热心教育人士鼎力赞助，慷慨解囊。新校舍于1953年动工，耗资30万元崭新巍峨的校舍，终于在1954年落成，计课室20间、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办公室及卫生厕所各一。²¹³其时适逢惠州会馆会长朱荣卢先生设宴庆祝六十大寿，将所有贺仪红包约1万余悉数捐给循人学校建校基金。²¹⁴惠侨互助会亦于1952年及1953年分别捐资循人学校建校基金11,754元和11,240元。²¹⁵

第二节 初中至高中成立时期

新校舍具备了基本设施，惠州会馆董事部即策划开办中学部，让学生能够继续接受华文教育。1955年，增办中学申请获得政府批准，暂由杨继任校长兼掌中学部校政，而张业隆则出任中学部主任，第一年招收四班初中一学生共176名。翌年聘张联圣为中小学校长，张业隆任中学部主任，杨继任任小学部主任，学生增至324人。年

²¹¹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1913-1963》，页10-11。

²¹²谢益田：〈话说当年〉，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1913-1963》，页83。

²¹³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1913-1963》，页12。

²¹⁴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届执委编：《惠州会馆馆史》，页62。

²¹⁵雪兰莪惠侨互助会编：《1965年雪兰莪惠侨互助会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页48。

底，惠州会馆总理廖玉钢先生委任张业隆为中小学校长，杨继任为小学部主任兼中学训导主任。²¹⁶

随着马来亚于 1957 年 8 月 31 日宣布独立，国家实行新的教育政策，并且将华小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学校体制也跟着更改，于是循人小学部改为循人标准型华文小学。由于小学接受政府新的津贴制度，是年又改为国民型华文小学。1957 年，循人中学首届初三学生毕业，董事部即向政府提出申请开办高中，但没获得批准。1958 年，中小学校正式分家，一切校务行政分开管理，中学校长为张业隆校长（1957-1987 年，1985 年 7 月开始，张世隆校长因病告假，由副校长陈永海出任代校长至 1987 年），邓怀仕任循中董事长。小学校长为杨继任校长，循人小学也得另组董事会，廖玉钢膺选为董事长。1961 年，教育局通知中小学不能共校舍，董事部即筹建小学新校舍，获政府拨出甘榜班丹五英亩地作为循人小学校址，14 间教室的新校舍在半年内即建成。建筑费 15 万元，其中 7 万元来自政府，其余皆为热爱华教的社会人士、社团（雪兰莪惠侨互助会亦捐资 8,000 元）、董事们的乐捐。1962 年循人小学迁去甘榜班丹新校舍，但因课室不敷应用，乃有 10 班小学部下午在陆佑路校址上课。申办高中获得批准。董事部即决定于是年开办高中。²¹⁷

1962 年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转折点，这一年政府颁布了 1961 年教育法令，并于 1962 年实施。此法令强制所有的华文中学选择成为政府全部津贴（国民型华文中学）或独立中学。如接受政府全部津贴，教学媒介语将改为英文，华文只是一个科目；独立中学则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当年全马接受政府全部津贴的华文中学为数不

²¹⁶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 13。

²¹⁷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 14-15。

少，循中董事部鉴于维护母语教育的原则及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同时确保华校不变质，因此，董事部一致通过拒绝接受改制，选择自立更生保持其独立华文中学的地位。换言之，自 1962 年 1 月 1 日始政府即终止循人中学的津贴。1964 年，马来西亚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²¹⁸所有的小学生，包括华小毕业生可直接升上中学，致使独立中学学生人数剧减，规模较小的独立中学甚至被迫停办。有鉴于此，循中董事部决定减少初中一年级学费。由于循中向来办学认真，学生成绩不俗，获得热爱华教社会人士的支持，学生人数反而有增无减。²¹⁹

第三节 循人中学的发展

循人中学教育方针一向为社会关爱华教的热心人士所共识。1963 年就读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人数激增，学生人数达 729，合共 15 班，造成课室不敷应附，校方迫不得已把十班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下午上课。因此，董事部筹备建新校舍，几经周折，经过一整年的筹备，一座耗资 20 余万元的四层楼的科学馆楼及一座大型食堂终于在 1964 年落成。当中惠侨互助会于 1962 年及 1963 年分别乐捐 1 万元和 8 千元；²²⁰新加坡李氏基金会捐助 2 万元，循中即以李光前先生父亲之名——李国专命名新大楼以表纪念。²²¹因校舍设备越致完善，热爱华教的学生家长们，纷纷让孩子们报读循中。自此，循人中学的设备已相当完善，校方成立多项课外活动，例如：商科学会、美术学会、幼狮会、童军团、圣约翰救伤队、空手道、华文学会、摄影学会等。²²²

²¹⁸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300。

²¹⁹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 15。

²²⁰雪兰莪惠侨互助会编：《1965 年雪兰莪惠侨互助会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页 48。

²²¹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 17。

²²²赖兴祥：〈循中校史〉，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届执委编：《雪隆惠州会馆馆史》，页 187。

1968 年，鉴于历年学生人数继续上升，董事部进行筹建三层图书馆大楼，并于 1969 年落成。底层作为体育室，二楼为课室，三楼为李伯麟（惠州会馆产业受托人：1963-1974）图书馆，阅览室及自修室等。1975 年李南燕先生辞退董事长职（1969-1975），董事会即进行改选，黄仕寿先生当选董事长，副董事长一职由叶立基先生担任。1978 年 1 月董事部发生内部分裂，15 名董事集体辞呈，1 月 28 日校园内又发生爆炸事件，在张业隆校长的调解之下稳定了局势。因此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使循中处于衰退期。²²³1981 年适逢循人中学二十七周年纪念，董事部联合循人校友会举办千人宴筹募学校发展基金，此次为董事部自创校以来第一次向公众筹募发展基金，筹得 55 万元巨额。²²⁴此项数额用以添加教学器材、扩充设备等。²²⁵

1984 年，董事长黄仕寿先生赞助全部建筑学校围墙费用。为了与时俱进，校方设立电脑室，购买 12 台电脑，让学生选修电脑课程。1986 年，董事部为了把循中办的更好，于是成立了“校务促进委员会”。成立此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策划循中发展计划，促进校务及学校组织。1987 年，校方藉三十三周年校庆，为学校筹款举办义卖大会，筹得 33 万元，所得款项用以装修校舍、科学馆，装置课室电风扇，购买教学设备如电脑、桌椅等。1988 年董事部聘请赖兴祥出任校长（1988-1996）。学生人数 930 人，学校行政组织与教学制度进行改革，初中一年级改为全日制。为了方便远方的学子前来就读，体育馆改建成男女生宿舍。为了容纳更多的华小毕业生，董事部计划筹

²²³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 18。

²²⁴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 18。

²²⁵赖兴祥：〈循中校史〉，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届执委编：《雪隆惠州会馆馆史》，页 187。

建新校舍，扩充电脑室，添购科学设备及购买铜乐队乐器。南洋商报举办皇帽十大义演，为循中筹得 33 万元发展暨建校基金。²²⁶

1989 年，学生人数剧增至 1135 人并实行全日制。为庆祝循中三十五周年校庆，校方教职员联合董事部、校友及学生举办嘉年华会。义卖会与文娱晚会共筹得 60 余万元发展暨建校基金。董事部鼓励热爱华教人士加入董事部，以进一步加强董事会组织。由于学生人数日增，董事部一致通过扩建循中并即刻向教育局申请扩建校舍准证，同时也向财政部提出申请建校基金捐款免税。1990 年学生人数 1345 人，男女寄宿生 129 人。建校蓝图虽获得教育部的批准，但还须得到市政府的准证才能动工。同年财政部也批准了 300 万元建校捐款免税证书。1991 年获得市政府的动工准证。董事部组织了一个阵容不小的万人宴建校基金工委负责筹款活动。学生人数增至 1540 人，由于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董事部成立一个扩建校舍委员会，筹建一座五层楼的校舍。8 月在校园内举办万人宴，共筹得 144 万元建校基金。10 月扩建校舍工程动工，1992 年年底五层楼的新校舍完工，共有 26 间课室及设备，建筑费为 125 万元，1992 年的学生人数继续上升至 1670 人。

1993 年举办新校舍落成庆典及筹募建校基金义卖会，共筹得 47 万元充作改善师资薪金的储备金。学生人数上升至 1850 人。1994 年，董事部改善薪资待遇，以月薪制取代节数制。教职员人数从原来的 76 人增至 94 人。学生人数则增至 2061 人。1995 年学生人数 2050 人，实行全日班制（即学生须参加独中统考及政府的考试）和普通班制（学生只参加独中统考）。由于学生人数从 930 人（1988 年）已增至 2050 人

²²⁶朱汇琳编：《櫓：2006 年度循人中学校刊暨初中五十四、高中四十三届毕业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循人中学四十三届高中毕业班联合会，2006 年，页 14。

（1995 年），原有的课室不敷应付，于是，董事部提议在原有的食堂地点建一座四层楼高的行政及教学楼。1995 年 11 月，董事部与家长联谊会联合主办群星演唱会，筹得 72 万元充作循中教育发展基金。与此同时，董事部落实改善学校设备十大建设，包括装修及冷气化办公室、礼堂、宿舍办公室、科学实验室及所有课室，扩建食堂及宿舍餐厅，装修、扩建及提升电脑教学设备，添购体育设备，设立多媒体教学中心，美化校园等。²²⁷

1996 年，董事部再度调升全体教职员薪金，为加速校内行政效率，校务进一步电脑化。是年 12 月，赖信祥校长呈辞，在校服务 40 年的陈永海副校长荣休（1957-1996）。学生人数在二千人内。1997 年，董事部聘请曾贤瑞出任校长。为了提高学生素质，校方定下重点发展纲领：“以素质教育为教育理念，以建设一成功校园为总目标”。校方拟定三大策略以达致目标：一，强化软体设备。二，强化第二课堂的建设。三，强化行政体系和公共关系。因此，董事部成立循中教育发展基金千人宴工委。此次千人宴共筹得 155 万元。1998 年的学生人数是 1843 人。

自此，循人中学有了明确的办学方针，更得到热爱华教的社会人士及家长们的支持，例如张奕标歌唱学院于 1998 年 8 月主办全国妇女卡拉 OK 观摩赛为循人中学筹款，筹得 43,000 余元。同年 12 月，吉隆坡人镜慈善剧社义演白蛇奇缘为循人中学筹募经费共得 4 万余元。为能培训出优秀的运动员，董事部拨出 10 万元整修运动场及修建跑道。同时董事部也拨款 35 万元购买 70 台新的电脑及修建梯阶式讲堂。1999 年，全校学生人数为 1833 人。1998 年循中毕业生联合会及陈松青董事赞助建造了一间梯阶

²²⁷朱汇林编：《櫓：2006 年度循人中学校刊暨初中五十、高中四十三届毕业特刊》，页 14-15。

式视听讲堂。今年（1999 年）校方主办“循中之夜”大汇演以庆祝四十四周年校庆。筹获 23 万余元的教育发展基金，黄仕寿董事长宣布循中的发展大蓝图。²²⁸

循中进入二千年代，学生为 1842 人。循中董事部在董事长黄仕寿的领导之下，不断的增加新校舍，提升教学设备与质量，致使循中口碑甚佳。根据循中发展大蓝图，发展项目共分为三期：

第一期：撤除现有的食堂，在原地建一座五层教学大楼，除底层作为食堂用途之外，其余四层全辟为课室共 28 间。

第二期：新建一栋内有一可容纳 2000 人的礼堂、二间讲堂、会议中心、行政中心、图书馆、电脑室、活动中心及课室等。

第三期：重建一栋可容纳 300 人的学生宿舍及 330 个车位的停车场。²²⁹

循中建校委员会为了早日实现第一期的目标：五层教学大楼，即展开筹备千人宴筹款工作。2001 年 3 月 13 日恭请拿督郭洙镇、陈广才及陈记光三位副部长主持动土礼，新的教学大楼工程于 2001 年 4 月 2 日正式开工，同年 4 月 13 日即获得财政部筹款免税证证书。2001 年 7 月 7 日举办筹募建校基金千人宴，筹得超过 400 万元的建校基金。2001 年 10 月，董事部决定翻新‘E’字楼校舍。新的教学大楼及翻新‘E’字楼工程完毕，全新的教学及设备于 2002 年的新学年开始使用。教学楼命名“黄仕寿教

²²⁸朱汇琳编：《檣：2006 年度循人中学校刊暨初中五十、高中四十三届毕业特刊》，页 15-17。

²²⁹《二千年度循中校刊暨高中三十七、初中四十四届毕业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循人中学第三十七届高中毕业班联合会出版，2000 年，页 24。

学大楼”，因为董事长黄仕寿捐出大笔义款，并带动了募捐活动。²³⁰自 2002 年开始，学生人数超过 2 千人。2005 年 7 月举办 50 周年校庆千人宴，筹得 250 万元贷学基金。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董事部拨款 180 万元把宿舍楼改建成英语教学楼，英语教学楼于 2005 年 12 月底落成。²³¹

为使教学达致更好的效率，董事部于 2006 年 6 月在全校课室内里安装多媒体电脑投影机。2007 年 1 月循中正式使用 eclass 网络教学模式。为了实现发展大蓝图第二期的项目：可容纳 2000 人的综合大礼堂，2007 年 8 月举办筹募大礼堂基金千人宴，成功筹得 910 万元建校基金。此项工程于 2008 年 7 月动工并预期 2009 年 5 月完成。综合大礼堂于 2009 年 10 月正式落成及启用。2010 年 4 月筹款暨庆祝综合大礼堂落成千人宴，共筹得 455 万元。²³²

循人中学在过去的 57 年以来，由于获得热心爱护华文教育的社会人士的鼎力支持与学生的家长们的信赖，以及循中的董、教、学三方面的合作之下，不断的扩建校舍，教学设备不断的与时并进的改善，循中才有今天巍峨壮观的校舍，为学子们提供一个完善的学习环境，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无论在科学、文学、工艺、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不俗的表现，如从商者有古润金、傅兴汉、林福南；从政者有雪兰莪州议员黄冠文、李映霞、欧阳捍华；城市土地运用交通规划传家吴木炎；马来西亚留台联

²³⁰ 《2002 年度循中校刊暨高中三十九、初中四十六四届毕业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循人中学第三十九届高中毕业班联合会出版，2002 年，页 29。

²³¹ 朱汇琳编：《槽：2006 年度循人中学校刊暨初中五十、高中四十三届毕业特刊》，页 18-21。

²³² 认识循中：吉隆坡循人中学 TSUN JIN HIGH SCHOOL，

<http://www.tsunjin.edu.my/xoops/modules/mytsunjin/history.php> 21 Nov 11。

总会长姚迪刚，马来西亚中兴大学校友会会长古新隆，留日中心陆培春及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²³³

第四节 循人学校夜学部

战后经济萧条，一切有待复苏，人民生活困苦。1946年，郑为信校长获得惠州会馆董事部的同意，针对当时的局势毅然开办循人夜校，一方面可让不能进入正规学校的超龄生就读，同时又让日里从事各种不同行业的贫苦子弟继续求学，因此，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也为老师们增加收入，郑校长把收到的学费扣除所有的消费，悉数归兼职夜校的老师们。²³⁴郑校长兼任夜校校长，教员计有杨继任、杜觉明、廖一通、彭立夫、范和美及廖有才等老师。每月学费为2块钱，科目方面有国语（今称华语）、历史、地理、文牍（今称应用文）、音乐等；除此之外，还为学生办课外活动如乒乓、唱歌、远足、歌唱比赛、校际演说比赛等，每周上课六天，每晚上课2个小时。每周还有周会，郑校长每每在周会训话都不忘勉励、劝导学生们必须努力做学问，弥补日本占领时期失去的3年零8个月宝贵的求学时光。²³⁵

郑校长留给循人学校最宝贵的遗产是循人学校的校旗、校训与校歌。校训简而易懂，且意义深远。校旗由郑校长本人设计，校训——“诚（诚实）、爱（友爱）、忠（忠心）、毅（毅力）。郑校长所作词的校歌更是具时代性：踏上光明的大路，作时代的响导，要有健全的体格，要有科学头脑，诚、爱、忠、毅是我们基本信条，前程

²³³认识循中: 吉隆坡循人中学 TSUN JIN HIGH SCHOOL,

<http://www.tsunjin.edu.my/xoops/modules/mytsunjin/history.php> 21 Nov 11.

²³⁴林金花: 〈飞鸿雪泥〉, 袁慧芳编: 《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 页 10.

²³⁵谢玉田: 〈话说当年〉, 袁慧芳编: 《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 页 83.

无限，循人学校。²³⁶以校训、校歌观之，可知郑校长的为人，对中华文化的爱护与传播的热诚！1950年由于政治因素不利于郑校长，在紧急情况之下，董事部万般无奈仓足筹钱送他回中国。²³⁷根据校史资料显示，夜学部开办至1959年，²³⁸夜校是否从1960年停办，还需期待未来有新的资料被挖掘出来，才能进一步论证。

第五节 循人学校发展的三个时期

——雏形期、成长期与成熟期（1885年—2011年）

表 6：循人学校雏形期、成长期与成熟期的学生人数与教师人数（1885年—2011年）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雏形期 1885年（私塾）至	12人	×	1人	×
1913年	近80人	×		×
成长前期 1913年至	近80人	×		×
1955年		176人	23人	
成长后期 1955年至		176人	23人	
1962年	1000余人	1019人	43人	45人
成熟期 1962年至	1000余人	1019人	43人	45人
2011年	2165人	2874人	91人	168人

循人学校的发展具体可分成三个时期，即雏形期（1884年-1913年）、成长期（1913年-1962年）和成熟期（1962年之后）。

²³⁶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6。

²³⁷林金花：〈飞鸿雪泥〉，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13。

²³⁸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1963》，页60。

雏形期是从 1884 年私塾创设到 1913 年循人小学正式成立，私塾创设时只有 12 位学生和 1 位老师，发展到 1913 年循人小学创办时学生人数已接近 80 人，此段时期长达 29 年，实为日后循人学校之滥觞。

成长期则可作前期与后期之分，成长前期是由 1913 年循人小学创办及至 1955 年成功申办初中部，这段时期循人小学可说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起伏，1933 年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学校经历了被迫关闭一年黑暗期，次年学校重办复课。其后，循人小学在黄伯才和惠侨互助会两方面的合力支持下，终于在 1940 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校地，然而好景不长，1942 年至 1945 年日据时期的三年零八个月，学校停办，校舍、设备等尽遭破坏，循人小学在 1945 年 12 月复办时，上课地点又辗转回到惠州会馆。1948 年才回到陆佑路的临时校舍上课，及至 1954 年新校舍基本建筑落成后，循人小学才算是正式拥有了自己的校舍。隔年，循人学校终于踏上另一个里程碑，成功获得政府批准增设初中部，创设循人中学。

成长后期是由 1955 年到 1962 年，在这短短七年间校务发展迅速，中小学学生总人数多达两千余人，时任小学校长的杨继任与中学校长的张联圣积极改革校政，充实教学设备、开辟运动场、增设科学室、图书馆。1957 年国家独立后，政府实行新闻及教育政策，华小纳入政府教育体制之中，因而必须与中学分开，循人中小学之间相濡以沫的情形，在大趋势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只能无奈地顺应国家政策，分开独立发展。1958 年，循人中小学行政分开，小学董事也另行组织。1961 年 4 月，教育局正式通知循人学校，中小学不能再合用校舍，同时拨出甘榜班登的五英亩土地、备作新校址。在循人小学董事、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校友和社会热心人士、社团等等多方大力

襄助，再加上政府拨款 7 万元资助，循人小学才凑足建新校舍的经费，于次年 1962 年 4 月开始，正式在甘榜班登的新校舍上课。早于 1957 年循人中学首届初中生毕业，董事部已积极向政府申请增办高中，一直到 1961 年才获得批准，于 1962 年成功开办高中部，是年，循人中学也面对着改制的问题，循人中学董事部鉴于私立中学在教育界仍有其重要意义而坚持不改制，拒绝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贴，选择成为独立中学以捍卫华族完整的教育体系。循人小学的学生人数已从 1913 年开始创办时的近 80 人发展到 1962 年的千余人，49 年间的成长幅度超过 1200 巴仙。循人中学亦是发展迅速，短短七年间由 1955 年的 176 人直线上升到 1962 年的 1019 人，上升幅度高达 578.9 巴仙。循人中小学的教师总人数，也从 1955 年的 23 人增加到 1962 年的 88 人，其中小学老师人数为 43 人，中学老师人数为 45 人。

成熟期是从 1962 年至今，近 50 年的发展中，循人小学的人数已从当初的千余人激增至 2011 年的 2165 人，老师人数也已从 43 人增加到如今的 91 人。循人中学在这段时间的发展亦非常理想，学生人数更是从 1962 年的 1019 人激增至 2011 年的 2874 人，老师人数也已从 45 人增加到如今的 168 人，增加了整整 117 人。如今，循人小学与循人中学的学生总人数已多达 5039 人，老师的总数更是多达 259 人，回首当年创设私塾时的 1 位老师和 12 位学生的情景，循人学校的发展与成就更显得非常耀眼。客家人在雏形期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从倡导到资助，可说是出钱出力。循人学校的成长期亦随处可见客家人的参与襄助，从资金、设备、校地、校舍乃至学校的运作经费，大部分都来自客家人或客家人的组织如惠州会馆、惠侨互助会等，学校董事大部分皆由客家人担任，可见从雏形期至成长期的发展，都是深深受客家人的影响。

第五章 结论

客家人与马来西亚的开拓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大小城镇的形成与客家人扯上关系，尤以锡蕴藏量丰富的地区为甚。首都吉隆坡、联邦直辖区的新街场，雪兰莪的安邦、万挠与加影；霹雳的怡保、太平、华都牙也、金宝与美罗，以及森美兰的芙蓉都是客家矿工的聚居点。客家移民来到异乡，生活苦不堪言，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举目无亲，唯有转向神灵祈求心灵上的寄托与慰藉，请求神的指引与保佑。因此，这些城镇都具有历史较为悠久的寺庙。吉隆坡的仙四师爷庙、安邦的九皇爷庙、万挠的关帝庙、加影的师爷庙、怡保的霸罗古庙、金宝的谭公庙、芙蓉的千古庙。寺庙不仅成了移民的精神支柱，是社区的聚集点，方便来自各方言群的人们融入社会的主要场所之一，并且促进各华族群体的和谐共处。

客家人是马来西亚人数较为庞大的方言群之一，2000 年客家人口总数接近 110 万，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主要分布于首都吉隆坡和雪兰莪（30 万）、砂拉越（16 万）、沙巴（15 万）、柔佛（14 万）及霹雳（13 万）。²³⁹早期（二十世纪以前）马来亚地缘性组织有个特殊现象，方言群人口较少的地区反而更早出现地缘性组织。英国人莱特（Francis Light）于 1786 年占领槟城，相隔只 15 年，即 1801 年，客家人在槟城即建了马来西亚最早的华族方言群地缘性组织——嘉应会馆。1805 年，客家人在马六甲创建了马六甲惠州会馆，这是马来半岛的第三间会馆。

²³⁹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hinese Population by Dialect Group, Malaysia, 2000*” (Putrajaya, unpublished data, 2003).

促使客家人比其他方言群较早成立会馆的因素众多。首先，莱特占领槟城后，立刻于 1787 年委任籍贯漳州的辜礼欢担任甲必丹。由于受到方言的隔阂，以及当年华人社会各方言群分立。闽南人士担任甲必丹，难免较倾向保护其方言群的利益，甲必丹与其他方言群也无法相互有效的沟通。与此同时，当年槟城的客家人口比闽南人数少得多，在经济方面也不大如具备强大经济能力的闽南人。²⁴⁰由此可见，客家人无论在人数或经济的实力上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²⁴¹因此，处于弱勢的客家人为了保障自身群体的利益，建立会馆以凝聚力量。其次，客家人嵌入华南区域较迟，曾遭受早已定居此处者的敌意与歧视，导致他们的群体意识特别强烈。其三，客家人在移居和定居东南亚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这与十八世纪末期著名嘉应人首领罗芳伯于西婆罗洲建立了中国海外华人最早的兰芳共和实体（兰芳大总制）的公司统治有关。该共和实体促使更多的客家人移居西婆罗洲、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及东南亚各国，移居的过程以及兰芳共和实体的兄弟会似的政府统治下，增进了他们的组织能力。最后的一个因素，认为是由于五次的迁徙造成客家人浓厚的群体意识。

早期会馆主要的职能是宗教与社会、福利和仲裁。会馆内设神龛为飘扬过海南来谋生者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会馆定期举办祭祀、迎神等活动，为会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际交往场所，让会员融入社会。早期的会馆也为那些初到南洋谋生者提供援助——提供临时住宿、协助安排工作、照顾生病老逝的同乡，即为那些孤单贫病交加者给予免费的医药或疗费、安葬孤苦无依去世的老者。会馆同时也扮演仲裁庭的角色，为群体及帮派调解内外的纷争。会馆也担当起传播承传中华文化的任务——举办祭祀、迎神及设立学塾于馆内。

²⁴⁰颜清湟著，栗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39。

²⁴¹颜清湟：〈新马早期客家人方言组织（1800 年至 1900 年）〉潘明智编著：《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页 303。

吉隆坡社区的形成过程形成一个特殊的脉络，首先建立庙宇，其次是创建会馆，而后是创办学校。这脉络明显的说明南来的华人首先为自己寻找心灵和精神上的慰藉，之后创建会馆凝聚同乡力量，以及达致互助互惠，接下来为下一代的教育而兴学办校。华人向来重视教育，民间兴办教育更是历久不息的传统，华人大量移民马来西亚各地之后，自奋、自发、自资的兴学办校，大多数的私塾、华文小学是于马来西亚独立前由华人社会自资创办的。时至今日，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及 60 所独立中学的发展（包括各类的设备、旧校舍的翻新或增建校舍等）经费仍然依赖热爱华文教育的社会人士的捐资，这就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制度是东南亚甚至世界上少有的。

马来西亚早期的私塾学堂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延伸。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富裕家庭在自家开设教馆或坐馆；塾师为了生活私自在家里传道授业的家塾或私塾；会馆、神庙设立的义学、义塾或书院，多以各方言群自己的方言为媒介语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经》、《四书》、《孝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古籍，以及珠算、书法等。学塾的特点：学生人数少，设备简陋，塾师大多无专业资格。有史可考由私塾发展至现代小学，而后至中学的华文中学并不多，郑良树的考证所得有四间中学的前身为私塾。即霹雳怡保培南中学、霹雳江沙崇华中学、砂劳越诗巫卫理中学及吉隆坡循人中学。60 所独立中学，每一所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及研究的对象，但以客家人倡导，先以私塾形式再逐渐发展至中小学的形式，更是当年吉隆坡第一所私塾而至现在成功转型的学校，绝对是马来西亚华人教育体制中的一个特殊存在。这个案例更可说是华教的其中一重要的发展类型。60 所独立中学的发展各有其不同之处，有许多更是因为类似的历史因素及社会因素所形成，循人学校可谓是其中一种重要类型。

循人学校从一所附设于惠州会馆的私塾逐渐发展至今日拥有自己校地的循人独立中学。循人学校发展过程中的辛酸苦楚，唯有真正付出参与校政、劳苦功高、身历其境的董事们、校长、老师、学子们及热爱华教的社会人士能体会个中滋味。循人学校创办时是附设在雪兰莪惠州会馆的一所私塾学堂，因此循人学校与惠州会馆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循人学校的经费很大部分来自雪兰莪惠侨互助会的捐助以及雪隆惠州会馆。²⁴²自 1938 年至 1964 年，惠侨互助会总共捐助了 204,744.97 元。²⁴³1965 年惠侨互助会再次拨款赞助循人学校 1 万元建校基金。²⁴⁴惠侨互助会成立于 1938 年，章程第十四章附则第五十条规定，“本会每年收入纪念费，除作纪念费用外，所余款项，全数拨作吉隆坡循人学校经费。”²⁴⁵直至今天惠侨互助会每年都乐捐一笔钱给循人中学，由于受到社团注册局的限制，乐捐数目相对减少。²⁴⁶

在办校过程中，循人学校因环境局势的不允许，被迫停办两次，即 1933 年遇上世界经济萧条及日据时期。循人学校得于 1934 年及 1945 年两次复办，全仗惠州会馆的鼎力支持与策划。多次迁校的困境严重影响了课业的进度，惠州会馆会长黄伯才有见于此，于 1940 年倡议购买校地。黄伯才与雪兰莪惠侨互助会各捐出一万元合资支持下，循人学校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校地。循人学校的发展，自创设以来，在董事部的支持下得以健全地发展，从私塾到小学甚至是发展到中学，都获得了董事部的无条件配

²⁴²黄安平：〈循人中学继续向前走〉，《南洋商报》雪隆增版（三），1987 年 9 月 15 日。

²⁴³雪兰莪惠侨互助会编：《一九六五年雪兰莪惠侨互助会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65 年，页 48。

²⁴⁴吉隆坡循人中学毕业特刊编辑委员会编：《吉隆坡循人中学毕业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循人中学高中第二届毕业班，1965 年，页 15。

²⁴⁵雪兰莪惠侨互助会编：《一九六五年雪兰莪惠侨互助会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页 48。

²⁴⁶受访者：雪兰莪惠侨互助会萧金海（总务）、王有生（财政）和梁发（副主席）；采访者：林丽华，时间：8-11-2011（下午 2 点）；地点：雪兰莪惠侨互助会会所。

合，而董事部在 1989 年之前大多数理事都是客家人，从这个侧面分析，更能清楚明白地说明了客家人与循人学校之间的关系。

循人学校虽是客家先贤创办的学校，不过在很早之前就已突破了籍贯的藩篱，连任循中校长 30 年的张业隆老师是琼籍人士。从本文里亦可发现早期的循人学校校长一职由惠州会馆会长聘请，由此可见惠州会馆会长的权限及影响力之大。目前循中的经费主要来自各籍贯的董事、赞助人以及热爱华教的社会人士。早期的董事部成员来自惠州会馆、惠侨互助会及赞助人三个团体，每个团体各派出 15 人，总共 45 人；目前循中董事部的成员共 45 人，包括惠州会馆和惠侨互助会的代表各两位。虽然循人学校是由客家先贤创办的，1989 年，董事部却大开门户，广泛吸收各籍贯热爱华教人士加入，使董事部的组织更加壮大及健全。1955 年之前，惠州会馆董事部就是处理循人学校校务的单位，从委任校长、聘请老师、筹措经费、添置设备等等，都是由惠州会馆董事部负责决策。

目前马来西亚尚有 1280 多所华文小学，60 所独立中学及 3 所民办学院（北部槟城韩江学院、中部雪兰莪新纪元学院及南部柔佛南方学院）。此即体现了华族重视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使华族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能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以至不忘本、不忘根。有关华文教育的课题，华社共同为华教继续无私的付出，华教不但有能力在困境中生存，还会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一) 中文资料

(i) 专著

1.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檳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年。
2.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 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文教育三百年 1690-1990》，多伦多：Royal Kingsway Inc., 1992年。
5. 陈亚才主编：《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2006年。
6. 葛剑雄、安介生：《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郭丹、张佑周：《客家服饰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8. 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9. 黄汉民：《客家土楼民居》，福州：福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 孔永松、李小平：《客家宗族社会》，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11. 李业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7年。
12. 廖文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1951-2005）》，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6年。
13. 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出版，1999年。

14. 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年。
15. 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6. 李泳集：《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
18. 罗英祥：《飘洋过海的客家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 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怡保：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年。
20.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0年。
21. 王贻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
22.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23. 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
24. 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探究所，1980年。
25.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
26. 吴永章：《客家传统文化概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7. 肖平：《客家人》，成都：成都地图出版社，2002年。
28. 雪隆惠州会馆第一一八届执委会编：《雪隆惠州会馆馆史》，吉隆坡：雪隆惠州会馆，1997年。
29. 许云樵：《马来亚丛谈》，新加坡：青年书局，1962年。
30.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1. 杨宏海、叶小华编著：《客家艺韵》，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
32. 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33.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34. 袁慧芳编：《时代响导——循人学校史料汇编 1913 - 1963 年》，吉隆坡：大圃企业有限公司，2011年。
35.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
36. 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ii) 特刊

37. 《2000 年度循中校刊暨高中三十七、初中四十四届毕业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循人中学第三十七届高中毕业班联合会出版，2000年。
38. 《2002 年度循中校刊暨高中三十九、初中四十六届毕业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循人中学第三十九届高中毕业班联合会出版，2002年。
39.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仙四师爷庙，1989年。
40. 吉隆坡循人中学毕业特刊编辑委员会编：《吉隆坡循人中学毕业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循人中学高中第二届毕业班，1965年。
41. 马来西亚嘉联会银禧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银禧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嘉联会银禧纪念特刊出版委员会，1976年。

42. 特刊编辑小组编：《雪隆茶阳（大埔）会馆 125 周年及茶阳回春馆 124 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雪隆茶阳（大埔）会馆，2002 年。
43. 雪兰莪惠侨互助会编：《一九六五年雪兰莪惠侨互助会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65 年。
44. 朱汇琳编：《櫓：2006 年度循人中学校刊暨初中五十四、高中四十三届毕业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循人中学四十三届高中毕业班联合会，2006 年。

（二）论文

45. 曹淑瑶：〈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困境〉，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 年。
46. 曾松华：〈华族南移的背景与动向〉，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 年。
47. 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 年。
48. 陈育崧：〈星马华文教育近百年史绪论〉，王秀南编：《星马教育研究集》，新加坡：南洋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71 年。
49.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吴泽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
50. 古鸿廷、曹淑瑶、张晓威：〈战后马来亚地区闽南人与华文教育之发展〉，庄国土、林忠强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1. 古鸿廷：〈吉隆坡之坤成女中〉，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2. 古鸿廷：〈吉隆坡之中华独立中学〉，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53. 古鸿廷：〈麻坡之中化中学〉，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54. 古鸿廷：〈柔佛之宽柔中学〉，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55. 黄文斌：〈论析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客家人的参与（1859 - 1920）〉，《亚洲文化》第32期（2008年6月）。
56. 黄贤强：〈叶亚来：从平凡移民到不平凡领袖〉，何启良主编：《匡政与流变：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3年。
57. 李定国：〈客家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继承与发展〉，潘明智编著：《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年。
58. 利亮时：〈马国华文教育的发展道路：逆境挣扎与永继经营〉，祝家华、安焕然主编：《探索大马高教发展路向》，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8年。
59. 利亮时：〈1969年马来西亚种族冲突事件及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海华与东南亚研究》，第二卷，第一期，2002年1月。
60. 林水椽：〈独立前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
61. 林水椽：〈马来西亚小学及中学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椽：《马中文教与思想抉论》，怡保：艺青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62.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人物研究》中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

63. 李小燕：〈新加坡客家移民史与移民经验〉，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64. 刘锦云：〈论客家人的性格特征〉，《客家研究辑刊》1993年第2期（总第3期），1993年。
65. 罗勇：〈略谈客家人“耕读作家”的文化传统〉，《寻根》2007年第5期。
66. 沈慕羽：〈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奋斗史篇〉，本文宣读于1994年，台湾的东南亚华人教育国际研讨会，屏东：国立屏东师范学院，1994年6月6-8日。转引自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
67. 王秀南：〈星马汶教育发展史纲〉，宋哲美：《星马教育研究集》，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4年。
68. 杨鹤书：〈客家人适应方式的转变与他们对马来亚早期开发的贡献〉，郑赤琰：《客家与东南亚》，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
69. 颜清煌：〈新马早期客家人方言组织（1800年至1900年）〉，潘明智编著：《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年。
70. 叶华芬：〈马六甲华人史〉，张清江：《新马华人史译丛》，新加坡：陈孟哲，2007年。
71. 张晓威：〈华人方言群的消长与帮权政治的发展：以十九世纪末的吉隆坡华人社会为探讨中心〉，郑文泉、傅向红编：《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关系》，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9年。
72. 张宇鹏：〈客家文化琢磨〉，罗勇等编：《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73. 邹豹君：〈星马文化发展的地域分析〉，程光裕、许云樵等：《中马中星文化论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合作，1968年。

（四）报刊文章

74. 封慧芬报道：〈回应历史：古迹报道系列〉，《星洲日报》大都会，2000年7月14日。
75. 黄安平：〈循人中学继续向前走〉，《南洋商报》雪隆增版（三），1987年9月15日。

（五）互联网文章

76. 〈关于广东义山：广义简史〉，《吉隆坡广东义山》，<http://kfc.org.my/>，阅读日期：2011年8月17日。
77. 〈客家〉，《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wiki/>，阅读日期：2011年2月14日。
78. 刘崇汉：〈马来西亚的五邑华社团〉，
<http://wylib.jiangmen.gd.cn/jmhq/list.asp?id=3859>，阅读日期：2011年4月30日。
79. 认识循中：吉隆坡循人中学 TSUN JIN HIGH SCHOOL，
<http://www.tsunjin.edu.my/xoops/modules/mytsunjin/history.php>，阅读日期：2011年11月21日。
80. 同善医院 Tong Shin Hospital，<http://tungshin.com.my/>，阅读日期：2011年5月20日。

81. 吴福文：〈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

<http://blog.udn.com/teddy5422/3715661>，阅读日期：2011年2月4日。

（六）外文论著

82. 〈1881年7月24日，叶德来致英殖民政府的一封信〉，马来西亚国家档案资

料，No. Penerimaan:1957/0001748, No. Fail:91/82。

83.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hinese Population by Dialect Group, Malaysia, 2000*” (Putrajaya, unpublished data, 2003)

84. J. M. Gullick, *Kuala Lumpur, 1880 - 1895*,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s (M) Sdn. Bhd, 1988.

85. J. M. Gullick, *The story of Early Kuala Lumpur*, Singapore: Donald Mose, 1956.

86. S. M. A. Alhady,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Surgery In Malaysi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urgery*”, Volume 48, Issue 4, August 1978.

87. Wan Ming Sing, “Yap Ah Loy And Hsien Szu Shih Yeh Miao”，马来西亚国家档案资料，文件归类：No. Penerimaan:1957/0001748, No. Fail:91/82。

附录（一）：《南华义学条义十五条》

一、	拟本屿开设义学，先和平章公馆开设，或将来经费充裕之后，随于东西南北各处添设，每间限生徒二十名为一馆。
二、	义学首在择师，心求品学兼优，精神充足，方可聘请。凡有沉湎于酒，嗜吸洋烟及事务纷繁者，不得定聘。例先将馆内规条送阅，愿受聘者方送关书。
三、	学生拟定年在八岁至十五岁止，方准来读。其父兄必须开列姓名年岁地址，方可定期进馆。
四、	义学之举，原为清贫子弟而设，亦为造就人材起见。苟有富裕，力能延请者，由其自便；若仍爱意送入义学者，随其父兄捐助多寡，交总理收贮，以应义学之需。
五、	学生中果系极贫，而天姿颖异者，自当刮目相视，本医院将来另设大义学讲解，以期小子有造。
六、	学生如系平常资质，准其读两、三年为额，使知文字，便可营生，免阻后人之进。
七、	塾师定议，每年正月下旬启馆，十二月中旬散馆。年中除清明、中元二节放假外，倘有要事，至多放假三天。如遇要紧事务告假，祈专托台位妥当亲朋代为权理，以免生徒荒疏。仍须通知总理，不得私行托代。
八、	议每月致送修金二十员，连工人膳用在内。另每年加送茶人家火六员，须雇工人一名在馆中打扫地方，伺候茶水等事，免使生徒煎茶扫地，致招物议。
九、	塾师由本医院位置某馆，以昭公允
十、	生徒自进馆后，务要循规蹈矩，奋志攻书。如有不遵教训，及非家中有要事，并不告假而逃学至十日以上者，该塾师知总理，令其出馆，免使生徒效尤。
十一、	义学之师，非只教书，并教礼仪、辑让、拜跪、动静、应付，要循规蹈矩。倘不遵教训，即为警责，使小子知所畏惧，异日方能成材。
十二、	馆中晨早念书教书，上午学生攻书，下午熟读呈书。日中或有余闲，即宣讲阴鹭文及果报诸书，使小子知善所从。
十三、	来义学读书者，大半非为科名起见，如资质平常者，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如已读完，无大出色者，则教以信札，俾其谋生有路。
十四、	义学启馆之后，本院总理等，每月分巡查各馆子弟。所习礼仪书字，如受教者，酌为奖励；倘有懒惰，不循规矩，经业师严加教训而仍不从，且无愧奋者，便是废材，即告知他父兄，着其出馆。乃见赏罚有方，咸知受教之益。
十五、	每逢朔望日，业师须将圣谕十六条款，并忠君、孝亲、敬长诸事，明白宣讲，令其身体力行。

YAP AH LOY AND HSIEN SZU SHIH YEH MIAO*

by

WAN MING SING

Yap Ah Loy was the third and most famous of the five Kapitan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which began with the mining expedition to Ampang in 1857. For about seventeen years (1868-1885), he was a very powerful Kapitan China and dominated the scene in Kuala Lumpur. He is accredited not only for giving Kuala Lumpur peace and order but also buildi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road and hospital, school and temple.

The Hsien Szû Shih Yeh Miao (or temple) in the heart of Kuala Lumpur town was established by Kapitan Yap Ah Loy in 1864 for the memory and worship of the famous Kapitan Shêng Ming Li of Sungai Ujong, a sworn brother of the former. It was later rededicated to include the memory and worship of another sworn brother, Chung Lai, who was the most trusted and valiant lieutenant of Kapitan Yap in the years of the Civil War in Kuala Lumpur, 1870-1873.

Kapitan Shêng Ming Li of Sungei Ujong who became the local deity Hsien Shih Yeh was born in 1822 in Hui Chou district, Kwangtung Province. It is said that on the evening of his birth a circle of brightness surrounded the abode of the Shêngs. Villagers were pleasantly surprised, for they knew that a holy child was born. The child proved to be exceptionally intelligent. He started school at the age of seven. By fifteen he was not only well versed in Chinese classics but also in the Chinese art of self-defence. His teachers confidently predicated that young Ming Li would be an important person someday.



Yap Ah Loy.

National Archives photograph.

Banditry was rife in the village and the Shêng family moved to Hsin An district in 1837. He was then fifteen and sought employment as an apprentice under a general merchant. He remained in that position for fourteen years and was highly praised for his industriousness and enterprise. At the mature age of twenty-eight he sailed for Nanyang to seek his fortune.

In the Autumn of 1850, he arrived in Malacca full of enthusiasm. He

*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official booklet on *Hsien Szû Shih Yeh Miao* published in 1957.

was received by a fellow Hakka named Ch'ên Yü Fa who offered him employment in the Hung Fa Store, dealing in general provisions and tin ore. The young immigrant went about his task with zest and the business prospered as a result.

In 1859, Shêng Ming Li was assigned to set up a branch in Sungei Ujong. He went there and established the Ming Fa Trading Company. Under his good management, the Company was an immediate success. Besides being gifted in business, he was also adept in public relations. It was due to his tact and integrity that many a dispute between rival Malay factions or between the natives and Chinese miners was amicably settled. Thus he was soon appointed Kapitan China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ungei Ujong.

Yap Ah Loy went to Sungei Ujong about this time and served under Kapitan Shêng who was helpful and kind to him. Ah Loy soon became much attached to Kapitan Shêng.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attachment was mutual, for the two soon took the solemn pledge of sworn brotherhood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Shortly after Yap Ah Loy had gone to Kuala Lumpur, Kapitan Shêng was murdered while prospecting for tin in the jungle. That was in early 1862.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blood which flowed when his head was chopped off was white and not red (and for this) he was afterwards worshipped as a god."¹ The deified Kapitan Shêng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Hsien Shih Yeh. The temple in Asah, Negri Sembilan, (and not in Malacca as it is maintained by Middlebrooke) where the sacred tablet was placed became the main centre of cult worship of Hsien Shih Yeh.

There was "news that..... miracles were performed there daily. People

were cured, worshippers wer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and there was a growing belief that the dead Capitan was now a powerful god."²

The omnipotence of Hsien Shih Yeh spread far and wide. Yap Ah Loy, partly propelled by the duty of sworn brotherhood, made a pilgrimage to Asah to fetch the sacred tablet back to Kuala Lumpur for worship in October, 1864. The tablet was housed in a humble building which came to be known as Hsien Shih Yeh Miao. And in 1882 Kapitan Yap donated a big piece of land of six shop-house lots in Pudu Street for the building of a grand temple. Under the distinguished patronage of Kapitan Yap, the temple building campaign was enthusiastically receiv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elangor. The impressive Hsien Szü Shih Yeh Miao, as we know it today, was completed in late 1883. 1875

It is said that, when the tide of battle was against him during the Civil War in Kuala Lumpur Kapitan Yap on several occasions invoked the supernatural assistance of Hsien Shih Yeh. This was necessary because Kapitan Yap's mercenaries were the omnipotence of Hsien Shih Yeh and morally depressed on hearing the rumour that their Malay opponents were protected by a shield of black magic. On such perilous occasions Kapitan Yap publicly invoked the spirit and went to battle wearing the sacred table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belief in the unseen, guiding hand of Hsien Shih Yeh did boost up morale and stir the followers of Kapitan Yap to march bravely onto war. When the enemies were defeated and Ah Loy's hegemony over Kuala Lumpur was firmly established, the worship of

1. S. M. MIDDLEBROOKE: *Yap Ah Loy*, *JMBRAS*, Vol. 24, p. 22, July 1951.

2. *Ibid.*

Hsien Shih Yeh became more popular than ever before.

It seems that Yap Ah Loy had a great liking for sworn brotherhood, for he also entered into such a spiritual bond with Chung Lai, his most trusted and valiant lieutenant in times of war.

Facts about the life of Chung Lai are scanty. It is not known for certain when he was born, although there is no doubt that he was born in Chia Ying district, Kwangtung Province. He was a robust person, well trained in the art of combat. In his native village he often stood in the way of bullies who hated him for his guts. It is said that he fled to Nanyang on hearing that his life was in danger.

He was in Ipoh and then drifted to Kuala Lumpur when Kapitan Yap was getting himself established. He served under Ah Loy who admired his brave and loyal disposition. Gradually, the two became the most intimate of friends and, eventually, sworn brothers. Chung Lai rendered yeoman's service to Ah Loy on the field of battle in the Civil War. Kapitan Yap felt that he was much indebted to his sworn brother who died shortly after victory had been achieved. The sudden death of Chung Lai deprived Ah Loy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his profound gratitude. As a gesture of deep respect, Ah Loy elevated his deceased sworn brother to the status of a deity known as Szú Shih Yeh. Ah Loy reverently placed the image of Szú Shih Yeh side by side with that of Kapitan Shêng for the worship of posterity. He accordingly rededicated the temple for the joint worship of two local

deities instead of one. He changed its name from Hsien Shih Yeh Miao to Hsien Szú Shih Yeh Miao.

The local Chinese worship a multitude of gods and goddesses. Over the years, new deitie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temple which now has eight deities in total. To begin with, there are Hsien Shih Yeh and Szú Shih Yeh. The tablet of legendary Kapitan Yap Ah Loy has also found a place of honour there. In addition, five of the most common and popular deities worshipped by the Chinese in the Nanyang are there, too. They are Kuan Ti Kung, Tai Sui Shen, Kuan Yin Niang Niang, Chin Hua Niang Niang and Yin Hua Niang Niang.

Since 1907 the Hsien Szú Shih Yeh Miao has been run by a Board of Management of twelve representing the major speech groups of the Kwangtung, Kwangsi and Fukien Chinese in Selangor.

Today, the temple is still an active and growing religious centre. The most important day in the calendar of the temple is the Procession Day which falls on the 28th day of the 1st month of the Chinese Year. On that day, the images of Hsien Shih Yeh and Szú Shih Yeh are carried round Kuala Lumpur town as part of a fanfare procession with its usual accompaniment of Chinese dragon dance and gongs. And on the eve of Chinese New Year, the temple is invariably crowded with believers who have come to offer thanks for wishes fulfilled and ask for new ones, in the implicit knowledge that their powerful but benevolent Hsien Shih Yeh and Szú Shih Yeh will continue to watch over the Chinese in Selangor for yet another happy and prosperous year.

附录（三）：1881年7月24日，叶德来致英殖民政府的一封回函



Relative to the building of a new hospital

Kuala Lumpur

July, 24 - 81

H. B. Esq. Resident
Selangor -

Dear Sir,

I am in receipt of your letter
yesterday's date relative to the
building of a new hospital -
I have seen many of the principal
wharfs this morning & they all
need to subscribe for the same -
I will now make out a "Circular"
and send it to all the shopkeepers
- Kuala Lumpur & get them
- sign according to their trades &
occupations -

I remain

My dear Sir

Your faithful servant

葉德来

Yap Ah Loy
Captain China.